第二章 中國的國際安全及政策選擇

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擁有否決權及核武。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經濟快速成長且規模龐大，廣大的土地和人口規模，在地緣戰略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使中國成爲世界權力均衡的關鍵性因素，解決任何全球性問題時都必須將中國納入考量。

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對世界局勢提出基本判斷，認爲世界大戰不會爆發，中國與主要大國的戰爭可以避免，這種國際環境有利中國加速經濟發展，一九八一年中蘇關係開始正常化，中蘇關係三個障礙陸續解決，一九八四年正式提出未來五至十年不會發生大戰，共軍評估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可改良第一代戰略武器，進而發展第二代戰略武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第二次重新評價外在環境，認爲和平與發展時代來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可以共存，彼此競爭；但來自軍方和左派的民族主義者認爲和平與發展並非理所當然，要和平唯有透過鬥爭，霸權仍是世界不穩定與威脅的根源，而且圍繞資源、種族和宗教衝突不斷，南北衝突可能性仍在，大戰雖可以避免，但仍有可能發生。[1]進入一九九〇年代，東歐遽變，蘇聯解體，持續 40 多年的冷戰狀態宣告結束，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蘇聯解體及東歐共黨政權垮台對中國產生下列影響:第一、中國成爲最後的社會主義大國；第二、中國面臨必須重新思考改革開放，如何在無民主化的情況下爭取和平與發展；第三、蘇聯崩潰促使中國內部少數民族不安；第四、中國所面臨的戰略態勢轉變，中國無法再從中美蘇三角關係之權力平衡中獲益，因爲俄羅斯正積極與西方整合；但蘇聯崩潰使得俄羅斯對中國潛在威脅急劇下降，有助於俄中關係非軍事化，包括邊境撤軍降低北方威脅，同時俄羅斯對外蒙、越南及印度之支持降低，使中國可以免受蘇聯軍事圍堵。

綜觀世紀之交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領導人自我評估有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2]中國必須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3]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爭取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

---

[1] 「三大障礙」係指中國認爲中蘇關係要正常化中國必須先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去除中蘇關係的障礙。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10，頁 3-39。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s Security The New Roles of the Military*,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8, pp.60-65.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二 0 一 0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474。

[3]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廿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90-691。

環境是可能的。[4]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還沒有根本改變，[5]中國的安全環境仍然存在可能干擾國家發展、威脅國家安全的不利因素。[6]本章將探討中國領導人所認知的國際安全威脅及政策選擇。

第一節 中國的國際安全威脅

綜觀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領導人相關論述，彼等認爲干擾國家發展，威脅國家安全的不利因素主要包括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制裁、全球化負面效應、霸權主義、中國威脅論興起等威脅與挑戰。以下將分別探討中國領導人對這些安全威脅的認知，並分析上述安全認知乃事實存在或中國領導人刻意渲染誇大。

一、國際制裁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美國針對中國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系列舉措，宣佈對中國採取五項制裁措施，停止對中國出售所有武器，對中國留美學生要求延長居留給予同情處理；立即停止與中國軍事人員之互訪，對北京受傷學生給予人道和醫療援助，繼續檢討與中國其他方面關係。美國國務院宣佈取消邀請中國國防部部長秦基偉、海軍司令員張連忠、外交部長錢其琛等訪美計畫及其他一系列互訪活動：撤出所有駐北京的外交官家屬，暫停科技交流合作：削減向中國出口電腦、武器系統、衛星及信貸等具體措施。六月廿九日和七月十五日，美國參、眾院通過制裁中國法案：一、停止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對美商在大陸投資或任何商業行爲擔保。二、美國政府停止貿易發展署在中國任何活動的資金運用。三、停止包括直昇機及其零配件等國防項目對中國出口。四、停止供應警用控制罪犯的工具和偵察設備。五、停止與中國的核子和平用途合作，任何核子技術、設施和組件，停止對中國出口。六、任何有美國技術在內的人造衛星，不得交由中國所擁有的發射工具發射。七、與巴黎統籌委員會成員國談判停止放寬對中國輸出貨物和技術，並加強管制。九月廿七日眾議院通過反對向中國提供財政援助決議。參眾兩院並重新研究是否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美國政府宣佈暫停向中國出口衛星和衛星零組件:限制向中國出口高速計算機:禁止向中國出口與導彈有關的產品。[7]

---

[4] 江澤民，「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頁 969-975。
[5] 江澤民，「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的演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6。
[6] 張萬年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軍事科學出版社，北京 1999.12，頁 138-139。
[7] 楊中美，《中共外交教父錢其琛》，台北：時報文化，1999.06，頁 142-143。

歐共體成員國繼美國之後發表聯合聲明，對中國採取下列制裁措施：一、中斷軍事合作和禁止軍售:二、凍結現行合作計劃，延遲新的合作項目。三、限制文化、科技交流計畫。四、在各類國際會議中提出中國迫害人權問題。五、延遲審核中國新的信貸要求，並敦促世界銀行採取相同之配合行動。設法向中國派遣獨立的觀察員，考察中國對民運人士的審判，並探視被羈押在監獄的人犯和獄政。延長在歐洲共同體國家大陸留學生簽證期限。[8]

日本外務省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宣佈暫停對中國 8100 億日元的第三次貸款。[9]

面對上述的威脅，鄧小平於一九八九年十月接見泰國總理差猜表示：中國是打了廿二年仗建立起來的，建國後又進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戰爭，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不可能取得勝利，這樣一個國家隨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國內沒有人有這個本領，國際上也沒有人有這個本領，超級大國、富國都沒有這個本領。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建國以後，我們處於被孤立、被封鎖、被制裁的地位有幾十年之久。但歸根結底，沒有損害我們多少。爲什麼？因爲中國塊頭這麼大，人口這麼多，中國共產黨有志氣，中國人民有志氣。總之，中國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國際風雲怎麼變化，中國都是站得住的。[10]此後，鄧小平並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爲」作爲因應中國外在國際環境的戰略方針。[11]

鄧小平雖然口頭表示中國不怕制裁，但錢其琛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立即以外交部部長和黨組織領導名義，召回一百五十多名駐外使節、總領事、商務代表及國際組織代表，七月六日至十二日在北京召開第七次駐外使節工作會議，學習鄧小平講話和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錢其琛做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報告。中聯部和對外經貿部部長都做了專題報告，江澤民要求駐外人員既要講經濟，又要講政治：既要講友好，又要講鬥爭；既要講原則，又要講策略。錢其琛強調，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將一如既往地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不放。[12]

二、全球化的衝擊

資訊科技加上後布列敦森林時代（post-Bretton Woods）數以兆計不受政府控制的資本，共同構築無法預期也無法逃避的國際金融的運作邏輯，無論中南海極

---

[8] 同上，頁 144。
[9] 同上，頁 144-145。
[10] 同上，頁 145-146。
[11] 同上。
[12] 同上，頁 150-151。

端民族主義當權者的意願如何，全球化的科技邏輯正逐漸影響中國當權的政策選擇。[13]中國國家領導人對於全球化的認知主要表現在江澤民、李鵬及張萬年等國家領導人的相關講話。

李鵬於一九九五三月十一日及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九日分別在聯合國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各國議會聯盟第九十六屆大會上講話指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世界各國的聯繫越來越密切，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孤立於世界經濟之外而得到發展，國際犯罪、販毒、環境等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需要各國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廣泛的國際合作。[14]故其呼籲共同解決保護環境、控制人口、消除貧困、增加就業、安置難民、緩和種族矛盾、解決宗教糾紛、提高婦女地位、增進兒童福利，以及禁止吸毒販毒和防止愛滋病蔓延等跨國界問題，維護全球社會穩定。[15]

張萬年在其主編的《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一書指出，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貿易自由化的範圍正迅速擴大，金融國際化的進程正明顯加快，時間、地域、國界對資本流動的限制作用縮小，生產跨國化的體系正逐步形成。經濟全球化有如一把雙刃劍，發達國家竭力維護舊的經濟秩序，借助其在國際經濟競爭力方面的優勢，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斷減少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比重，甚至採用援助和投資資金倒流、限制科技成果轉讓、轉嫁危機等手段，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拉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但發達國家間對資本、技術、貿易、市場的爭奪加劇。而發展中國家主要面臨保護和發展本國經濟、打破發達國家的經濟壟斷和封鎖、提高參與國際競爭力等嚴峻的挑戰，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經濟體系過程中，往往被迫接受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條件大部分國際市場早已被發達國家瓜分、佔有，發展中國家因經濟實力較弱，難以拓展國際市場，且因金融體系欠完善和防範能力較差，可能遭受國際資本投機者發動金融打擊的風險增大。[16]

江澤民於一九九八年二月廿六日召開之十五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日益緊密，相互影響越來越大，誰也不可能關起

---

[13] 費李曼（Edward Friedman）,「民族主義能開創民主、繁榮與和平嗎？」，田弘茂、朱雲漢編，張鐵志、林葦芸譯，《江澤民的歷史考卷 （China Under Jiang Zemin）》，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2 月，頁 253-256。

[14] 李鵬，「共同努力締造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新世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022。

[15]李鵬，「在聯合國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282-1283。

[16] 同註 6，頁 20-23。

來搞現代化建設，不可能迴避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和激烈複雜的國際競爭。[17]

三、霸權主義

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報告指出，冷戰思維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擴大軍事集團、加強軍事同盟，無助於維護和平、保障安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還在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18]

張萬年等指出，美國等大國紛紛與中國建立夥伴關係，但遏制中國的暗流仍在湧動，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仍然有一股企圖遏制中國的逆流，這股反華勢力頑固堅持冷戰思維，將中國看成繼蘇聯之後的新敵人，不願看到中國的富強和統一，對中國綜合國力迅速的增長感到十分恐懼，竭力鼓吹中國威脅論，散佈廿一世紀西方世界必然會與中國發生衝突，主張西方世界聯合起來遏制中國。如美國對中國實行接觸政策時，宣稱「接觸」是推進美國理想和價值觀的最好辦法。同時又繼續對中國保持經濟制裁，在技術轉讓上限制中國，經常在人權、西藏、軍貿、知識產權、環保等問題上攻擊中國，製造麻煩，繼續堅持向台灣出售武器，干涉中國內政，對中國的統一大業起阻擾或破壞作用，西方國家這種兩面性是中國安全環境的不穩定因素。[19]

李鵬認爲美國對中國搞西化、分化，從根本上講，他不願意看到中國強大，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想遏制中國的發展，這個政策不會變，美國利用台灣做爲他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這個政策也不會變。[20]

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軍隊思想政治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冷戰結束後，美國倚仗其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加緊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實行新的砲艦政策，對世界和平構成嚴重威脅。西方敵對勢力亡中國之心不死，利用人權、民主、宗教、民族和領土等問題，採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手段，竭力對中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企圖搞垮社會主義中國。[21]

---

[17] 江澤民，「做好國內經濟工作，增強承受和抵禦風險的能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202-204-205。

[18]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41-42。

[19] 同註 6，頁 129-138。

[20] 李鵬，「要爲深化改革和發展經濟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日報出版社，北京:1997.12，頁 1614-1615。

[21] 同註 4，頁 969-975。

一九九九年北約對南斯拉夫展開軍事攻擊後，中國對美國霸權主義成爲戰爭根源之批評與示警聲浪急遽升高，認爲美國將竭盡所能建立一個單極世界，強化其霸權地位，並將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軍事攻擊及對中國大使館之轟炸視爲未來美日聯盟行爲的預兆。而閻學通、楚樹龍等中國學者認爲未來一、二十年美國會設法遏制中國的發展並阻止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角色之提升。[22]

從上述論述可以發現，在中國領導人的認知中，冷戰雖然結束，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美國刻正利用俄羅斯弱點，進行北約東擴，並強化其對歐洲北約盟邦之宰制。美國一直企圖西化、分化中國，運用美日聯盟及台灣遏制中國。

中國指控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之霸權行徑包括干涉內政、軍事介入、經濟制裁和文化滲透。在干涉內政方面：中國認爲政治強權有所發展，以美國爲首的某些西方國家仗恃其實力優勢地位，粗暴干涉別國的內政，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到處推行西方的政治模式與價值觀，竭力在政治上控制發展中國家，致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局不穩，社會動盪，戰亂不休，自一九九〇年代起，西方大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連續七次假借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美國等少數西方國家操縱下通過一系列決議，幾乎全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在軍事干涉方面：中國認爲自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後，美國對外動用軍事力量已達40餘次，平均每年對外用兵5次以上，大大超過其在冷戰時期對外用兵年均2.8次的紀錄，西方國家實施軍事干涉的形式和手段主要以軍事聯盟的形式出現，將冷戰時以防禦爲主的軍事集團改造成爲進攻性的擴張工具，使用高技術兵器，對精心選擇的目標實施襲擊。在經濟制裁方面：中國認爲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幾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國際對抗中，都使用經濟制裁與封鎖手段，或以經濟利益爲交換條件，逼迫對方讓步。在文化滲透方面日益公開。[23]

中國領導人及其學者對霸權主義的批評，乃以原霸主國必然遏制新興崛起的大國爲假定，但其顯然忽略霸權國家對國際安全、金融和貿易體制的貢獻，更漠視中國在此體制中搭便車行爲所獲取的不對稱利益，尤其美國乃中國出口導向企業產品重要的消費市場，中國與美國之貿易享有巨額的順差。[24]中國對美貿易依

---

[22] 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頁 78-92。

[23] 同註 6，頁 25-28。

[24] 霸權國家必須有長遠的視野，建構提升全球的福利體制；能容忍短期犧牲，以獲取長期性的全球利益，並使其從中獲取國家利益。故霸權必須解決公共財貨分配的問題，維持自由開放的貿易和金融體制，並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諸如，美國在歐洲防衛支出、容忍美國與日本及德國間的貿易逆差；讓美元成爲國際貨幣並維持自由貿易；對開發中國家進行外援與貸款。霸權衰微問題出在其他大國搭便車，以及霸主國調適能力下降所致。如美國國內利益團體分化，透過各種管道

賴與中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並與其政權合法性直接相關。[25]假如美國停止在太平洋地區充當警察，那麼日本政府很可能決定投入更多的軍費開支，中日可能出現軍備競賽。如果美國因中國的導彈威脅而從太平洋地區各基地撤軍，對地區安全將造成不良影響。[26]故所謂霸權主義威脅的認知，乃中國領導人及學者刻意渲染的主觀想像。中國領導人將美國在智慧財產問題對中國強硬態度，視爲美國不願看到中國迅速加入世貿組織；將美國未全面恢復自一九八九年取消的技術轉移，視爲延緩中國的經濟成長。並將美國鼓勵日本與南韓發展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美國倡導與亞洲國家進行雙邊或多邊結盟，視爲美國業已將中國視爲潛在敵人，希望藉此圍堵中國。此外，將美國的交往政策（engagement）視爲美國希望得到一些中方盟友，協助美國在中國內部製造分裂。[27]中國未能充分認識到其業已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區域環境，刻意誇大霸權主義的危害性，使中美緊張關係加劇。中國對外來環境的過度反應，導致其他國家將中國的威脅看的比實際情況更嚴重，如此形成惡性循環。[28]

四、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肇因於中國國力持續增長，中國不斷增加軍備支出，向俄羅斯採購大量精密的軍事裝備。尤其中國相對於美、俄、日而言，在傳統武器能力相對弱勢，故希望保持隱密性，以取得其他國家對其能力估算猜測之優勢，希望這些國家高估中國核戰力。中國認爲此有助其提高嚇阻能力，並可藉此提升其國家地位，但此一做法卻招致周邊國家批評衍生中國威脅憂慮。[29]

在美國的中國政策辯論曾出現警惕中國威脅論聲浪及遏制中國的主張，主要論點認爲中國仍然是一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與美國核心價值對立的極權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正在崛起中，且中國是一個要求改變現存國際秩序的地區大國;

影響政府決策，使得保護主義興起，如此必然扼殺自由貿易體制。John M. Hobso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4-45.同註 22，頁 78-92.

[2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Spring 2003.04, pp.34-44.

[26] 陳舟著，《美國的安全戰略與東亞》，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2002.01，頁 165-166。

[27] 傅高義（Ezra F. Vogel 編,吳福生譯，《廿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國關係（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9.8，頁 13-16。David C. Kang ,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Spring 2003.04,pp.68-72.

[28] 同註 26，頁 146-148。

[29] Tai Ming Cheung, "The Influence of the Gun: China's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litary, Party, and State Decision-Making Systems" ,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59-266；哈理斯（Stuart Harris），「追求強權地位的漫漫長路」，同註 13，頁 186-188。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Rand, 2000, p.2.

此外，中國利用其低勞動成本，引進高新技術，製造大量廉價商品向美國傾銷，同時卻對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製造障礙，造成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30]現實主義者認爲伴隨中國經濟成長、科技能力提升，中國崛起將顛覆區域權力均衡現象，故高度關注中國的修正主義傾向，擔心中國對現存國際體系造成挑戰，故要求美國政府應對中美未來可能的敵對關係預作準備，並強烈批評中國對台政策，指責中國對北韓輸出飛彈和核科技。[31]美國經濟民族主義者認爲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需要美國市場甚於美國有求於中國，除非美國運用經濟優勢強迫中國，否則中國可能成爲另一個重商主義的日本，故主張在中美貿易談判時美國應採取強硬立場，並祭出威脅。[32]此外，在美國許多意識型態的保守主義者、自由人權運動者，以及那些對中國廉價商品大量湧入美國市場不滿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公開指控美國行政部門順從中國共產黨獨裁，並認爲中國乃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威脅，而考克斯報告（Cox committee report）的公佈乃一個高潮指標，並有人主張以當年冷戰時期對待蘇聯之道對付中國，與中國斷絕貿易關係，並宣稱應與台灣提升軍事關係。[33]一九八九年初蓋洛普 Gallup 民調顯示，有 72%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有好感，但一九九五年下降爲 28%，有 69%認爲不友善或甚至有敵意。[34]

日本高度關注中國政治不確定性，軍事透明化程度，對釣魚台的領土訴求，與俄羅斯軍事合作，核試及導彈擴散，中國海軍在南海活動等舉措，加以中國日益提昇的區域影響力和投射能力，使日本安全政策制定日趨複雜。[35]儘管許多中國分析家認爲中國的行爲是防禦性的，只是爲了威懾台灣防止其走向獨立，但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強大，更加自信，日本決策相關人士對中國的不安全日益提升。日本政府針對中國核試驗，凍結對華無償援助。[36]在日本越來越多有影響力的人物將中國軍事現代化，一九九五及一九九六年對台軍事威懾，派海測船到日本近

---

[30]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0，頁 55-70。

[31] David C. Kang , op. cit.,pp57-68.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Introduction: China Joins the Word”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press, 1999, pp.8-10.

[32]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op. cit.,p.12.

[33] 美國經濟民族主義者以 Steve Forbes, Cary Bauer, John McCain 爲代表，而 Rep. Dana Rohrabacher 認爲中國乃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威脅。現實主義曾預測隨著日本經濟實力成長會重新武裝，且其國家行爲將更爲專斷獨行，但事實發展不然，權力最大化解釋無法說明日本成爲第二大經濟體而不向美國提出挑戰或日本何以未企圖負起本身安全防護責任，且日本對美國安全承諾未抱持懷疑的態度。David C. Kang, op. cit., pp.69-71.

[34] Joseph Yu-shek Cheng, “China’s American Policy: A Turning Poi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2,Number 2, Summer 1996,pp.65-66。

[35] Taeho Kim, “China's Evolving Bilateral Ties in Nor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gional Strategic Configuration”, in Jaushieh Joseph Wu, *China Rising: Implication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Growth in the PRC*，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1, pp.193-206.同註 26，頁 136-137。

[36] 劉江永，「1996-1997 年日本形勢報告」，戰略與管理增刊，北京：1997，頁 33-49。

海活動等等視爲中國對日本安全的威脅。[37]一九九六年日本《防衛白皮書》在形勢分析時指出，中國推進核戰力和海空軍力量的現代化，擴大海洋活動範圍，在台灣周圍進行軍事演習，進而導致台灣海峽局勢緊張等動向有必要加以注意。[38]一九九六年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提出《安全環境長期預測及日本防衛的應有狀態》內部報告，將中國作爲防範對象。該報告對中國海空軍力量的增強表示強烈關注，並預判到二〇一五年南中國海將成爲中國海，屆時麻六甲至巴士海峽的海上航道將隨時受到中國的威脅。所以日本將與本地區各國構築遏制中國霸權行動的壁壘。防衛廳擬定發射首顆偵察衛星計畫，加強對鄰國軍事情報的獨立蒐集能力。[39]

一九九八年印度核試驗時，印總理致函克林頓表示，印度此舉主要針對中國。二〇〇〇年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表示與印度有利害關係的地區將從阿拉伯海北部擴大到南中國海，並計畫與韓國和越南在南中國海進行軍事演習，中國非常擔心印度將中國威脅論變成事實。[40]

此外，有學者認爲一個國民生產毛額等於或超越美國的現代化中國，將無可避免地成爲一個與美國爭取世界強權的主要對手。尤其中國乃東亞區域傳統強權，中國受西方及日本侵略的歷史記憶，使中國強烈要求成爲一個受各國尊重的大國，其國力日增，對美的懷疑日甚；中國對台海和南海有強烈的領土訴求，而國家統一與民族主義情緒可能伴隨著中國經濟與軍事持續成長而上升，加以中國地緣中心信念深植，可能取代美國成爲亞太主要大國安全的維護者角色。屆時可能限制美國在東亞地區之軍事行動自由，控制美國在東亞及其以外地區之經濟管道，衝擊美國與大部分亞洲國家所享有的特權關係，破壞美國用以確保亞洲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的正式與非正式聯盟關係。而一旦中國改革崩潰或改革逆轉，將造成中國國內社會及政治衝突升高，出現一個脆弱不安的政權，屆時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下，中國政權可能在台灣問題、武器擴散、自由貿易、人權問題、朝鮮半島問題採取不合作態度。[41]

中國領導人如何認知中國威脅論本身就是中國是否成爲一個威脅的關鍵所在。錢其琛指出，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沒有擴張的傳統，相反卻飽經列強的侵略、欺凌和宰割。中國沒有侵占別國一寸土地，也從沒有向海外派駐一兵一卒。

---

[37] 同註 26，頁 136-137。
[38] 同註 36，頁 33-49；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著，同註 22，頁 179-181。
[39] 同上。
[40] 同註 22，頁 188-190。王金存，「世界大國關係動向」，李慎明、王逸舟編，《2001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02，頁 48-49。
[41]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 op. cit. p.186.

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其最大希望是保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不斷提高十二億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的國防政策完全是防禦性的，中國國防開支的絕對數字是大國中最低的，按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以及按人均計算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沒有能力去威脅任何人，也不需要威脅任何人。即使今後中國強大起來了，也不會搞侵略擴張，不會謀求霸權。中國不是前蘇聯，中國不是過去的德國和日本，中國就是中國，中國絕不會走別的國家的老路。那些散佈中國威脅論的人，感興趣的是在蘇聯解體以後，爲美國尋求新的敵人，即使找不到，也要製造一個。似乎只有這樣，美國才能生存，才能維持超級大國的地位。這實際上是舊時代冷戰思維在新形勢下的反映。對於中美貿易逆差問題，錢其琛指出日本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經濟競爭力很強，日本對美國出口主要是以高附加價值的技術密集型產品爲主。中國則是正在發展中的國家，工業底子薄，中國對美出口主要是以紡織品、鞋、玩具等低附加價值勞動密集型產品爲主，這些是美國已基本不生產或生產很少的商品，不會影響到美國就業，相反會給美國零售業和消費者帶來巨大好處。另一方面，中國從美進口大量爲中國經濟建設所急需的飛機、機械、電子、通訊等技術密集型產品。因此，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是一種優勢互補的關係，而不是一種競爭關係，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會對美國構成挑戰，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將繼續開放市場，進一步擴大從美國的進口。[42]

從錢其琛上述講話可以發現，中國領導人認爲中國威脅論並非事實，而是一種想像的威脅。但問題在於刻板印象中，中國往往將美國視爲擴張主義、帝國主義，將日本和印度視爲軍國主義，或具有侵略傾向；但卻自認爲中國是一個和平良善的國家，具有和平、守勢的傳統文化，中國崛起不會成爲威脅。且中國的外交辭令向有將美國描述成具有攻擊中國的傾向。[43]從中國指控美國爲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而中國周邊國家及主要大國興起中國威脅論的現象可以發現，想像的威脅可能使國際互動陷入安全困境。故前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曾表示，中國發展成爲一個安定的、開放的和成功的國家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拒絕那些企圖遏制或孤立中國的人的意見，那些方針會損害美國國家利益，而非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將中國說成魔鬼，如同把中國說成具有浪漫色彩者般，會將人引入歧

[42] 同註 7，頁 252-255。

[43] 李瑞環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廿六日在智利聯合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演講時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近現代歷史上多次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掠奪，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長期處於發展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悲慘境地。李瑞環，「發展當代中國的主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412。同註 27，頁 310-314。陳舟著，《美國的安全戰略與東亞》，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2002.01，頁 146-148。Alastair Iain Johnston , op. cit., pp.44-56.

途，這是危險的。[44]

中國軍力對主要大國及其周邊鄰國是否形成威脅，眾說紛紜。然誠如杭廷頓所言，中國廿幾年來經濟取得巨大發展，豐富中國的物質基礎，提高中國的地位和實力，中國正大力提昇軍力，大幅提高國防預算，重要的是中國將確立什麼要的目標。美國一直反對歐洲或亞洲由某一個大國主宰，假如中國企圖主宰東亞，美國會反對，就像美國反對日本主宰東亞，中美之間有許多問題要解決，前景如何要看兩國領導人如何理解彼此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需要，還要看中國控制東亞和對台動武的慾望有多強。[45]一九九〇年代用以說明中國領導人具有稱霸意圖的最有力證據是中國領導人一再表示美國的國力逐漸弱化，國際格局正由一超多強向多極發展；此明顯與美國領導者可望繼續保有在區域和全球主導地位之意圖衝突。亦為中國能否化解中國威脅論以營造有利於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提升之和平穩定國際環境之困境所在。[46]

第二節 中國的國際安全政策選擇

中國在一九九〇年代面對上述國際安全威脅，作出突破國際制裁、堅持改革開放政策、重新定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提出新安全觀、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積極參與聯合國、參與軍控體制並致力建立負責任大國形象。以下謹將各項政策選擇的內涵說明如後。

一、突破國際制裁

面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國家對中國之制裁，中國隨即調整外交戰略部署，先穩固與周邊國家關係，重點開展對第三世界的外交，紮穩中國的外交陣腳。並以中國具有廣大市場為籌碼，以日本為突破口，拉攏跨國企業赴陸投資，主動向美國是釋出緩解中美關係的信息。同時，捉住機遇，精確掌握波灣戰爭時機，靈活運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身分，突破國際制裁。

（一）釋放緩和中美關係訊息

鄧小平於天安門事件後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時表示，要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採取主動，中國不可能主動，

---

[44] 王緝思，「1996-1997 年美國形勢報告」，戰略與管理增刊，北京，1997，頁 17-32。

[45] 同註 26，頁 20-22。

[4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op. cit.,pp.25-30。Mark A. Groombridg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sts and benefits”, in David M. Lampton, Edited, op. cit., pp.173-175. Ted Galen Carpenter , “Confusion and Stereotypes: Policy toward the PRC at the Dawn of 21st Centry”, in Ted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 Dorn eds., *China’s Future: 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 , Cato Institute,2000, pp.69-71.

因爲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中國市場畢竟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中國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47]尼克森將鄧小平相關講話向布希（George Bush）匯報後，美國乃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以特使身分訪問中國大陸。鄧小平接見史考克羅時表示：中國在國際上有特殊的重要性，關係到國際局勢的穩定和安全，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儘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48]

除鄧小平向美國表達中國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之立場外，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錢其琛首先放出緩和中美關係訊息，利用參加聯合國四十四屆大會之機轉赴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演講，主動提出改善雙方關係四點意見：一、要承認差異，尋求和發展共同點：中美之間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根本不同，但不應成爲發展關係的障礙。二、不能把另一國的國內政治作爲恢復和發展的先決條件，中美關係出現困難，係因美國對中國實行制裁所引起的，中國內政不容干涉。三、要努力加強相互了解和信任。四、美國應妥善處理台灣問題。[49]

從鄧小平及錢其琛上述講話可以發現，中國爲化解西方國家經濟制裁對中國經濟建設之衝擊，突破外交困境。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在相關談話不斷凸顯中國具有廣大市場，同時擴大中國與美國等其他國家在維繫國際局勢穩定和安全的共同利益，並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讓步策略。如鄧小平在接見尼克森時要求美國在中美關係跌入谷底時，應主動讓步，但在接見史考克羅時則改口雙方都讓點步。

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訪問北京。中國同意在一九九一年年底前完成審議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在三個月內完成正式加入該條約之手續（中國人大常委會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九日批准中國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計畫）；承諾派代表團赴美談判解決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雙方簽署知識產權諒解備忘錄，宣佈保護美電腦軟體等產權五十年）；考慮在轉讓導彈及其技術時遵守「導彈及其技術控制體制」MTCR 相關準則。[50]顯見中國爲突破西方國家的制裁，在軍控、貿易等領域作出廣泛的讓步。

---

[47] 同註 7，頁 171-173。
[48] 同上，頁 174-175。
[49] 同上，頁 171-173。
[50] Joseph Yu-shek Cheng, “China’s American Policy: A Turning Poi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2, Number 2, Summer 1996,pp.51-57。同註 7，頁 176-182。

（二）善用常任理事國地位

中國在天安門事件後，重點開展對第三世界的外交，錢其琛自一九八九年七月廿日至八月九日陸續訪問波扎那、辛巴威、安哥拉、尚比亞、莫桑比亞、賴索托等國。七月廿至八月一日並轉赴巴黎出席解決柬埔寨問題之國際會議，與蘇、英、法、新加坡、日本等國外長會談，闡述中國和平解決高棉問題之立場。至九月初起，又先後訪問蒙古、埃及、敘利亞、突尼斯、約旦、伊朗、巴基斯坦等國。[51]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錢其琛並以特使身分訪問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和伊拉克，爭取在國際事務的發言權。[52]

一九八九年雖然美國正在對中國實施制裁，雙方仍未恢復高層會晤，但波灣危機發生後，美國需要中國合作，雙方聯繫和往來增加。一九九〇年九月廿五日錢其琛出席安理會外長級會議，闡述中國對海灣問題的立場。錢其琛並藉機會見60多個國家的外長或領導人。[53]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美國政府力圖在當月美方擔任安理會主席期間通過決議案，使聯合國授權必要時可以對伊拉克動武，爲換取中國贊成或不否決美國的決議案，主動邀請錢其琛正式訪問美國，中國決定掌握推動中美兩國恢復正常關係的有利時機，乃於十一月廿九日對該議案投棄權票，會後錢其琛應邀正式訪問美國，並於十一月卅日與美國布希總統會面，布希表示其重視美中關係，希望兩國關係逐步改善。[54]此一活動標誌中美高層停止互訪禁令獲得突破。在美伊波灣戰爭前後，錢其琛主動出擊、施展穿梭外交，扮演調停角色，除凸顯中國的大國影響力外，更使美國緩和對中國之制裁。[55]

（三）以日本爲突破口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等分別接見日中經濟聯合會會長齊藤英四郎，表達中國希望雙方以相互理解態度處理問題:一九九〇年六月，中國國務院委員李鐵映、中聯部長朱良相繼訪問日本進行遊說，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一九九〇年七月舉行的七國高峰會議上表達不孤立中國之立場，並解除經濟制裁之意願。一九九〇年十月恢復對中國之第三次日元貸款。一九九一年六月廿五日錢其琛訪日，與日本中山外相達成四項協議：一、中國希望邀請日本明仁天皇在一九九二年雙方建交廿週年時訪問中國。二、中國同意與各國討論人權問題，並願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改善關係，希望日本傳達此項訊息。三、中日在北韓接受國

[51] 同註 7，頁 151。
[52] 同註 1，頁 71-96。
[53] 同上，頁 71-96。
[54] 同上，頁 96-104。
[55] 同註 7，頁 274-276。

際機構進行核武檢查問題上合作。四、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於一九九一年八月赴中國大陸訪問。[56]中國以日本爲突破西方聯合經濟制裁之戰術奏效。

（四）妥善因應人權外交

中國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面對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巧妙運用異議人士之抓放時機，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中國的制裁與施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史考克羅以總統特使赴中國訪問，錢其琛同意一九九〇年六月釋放方勵之，取得中美關係改善契機。[57]中國於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四日，北京爭取奧運主辦權投票前假釋魏京生以及民運人士吳學燦、瞿偉民等人。[58]一九九四年三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訪問中國大陸，美國先逮捕大批異議分子，待錢其琛與克里斯多福會談時，允諾以保外就醫名義釋放著名異議人士王軍濤，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六日美國宣佈對中國最惠國待遇審查與人權脫鉤。[59]

二、堅持改革開放政策

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面對西方國家制裁，蘇聯崩潰之後，中國成爲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內部保守派擔心中國將成爲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目標。但中國仍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改革開放，中國如何做出此一政策選擇，關鍵在於中國重新建構其威脅認知。主要焦點在於天安門事件及蘇聯崩潰的導因在內部還是在外部？西方國家是否對中國策動和平演變，顛覆中國，以下分別探討其政策論辯與調整過程。

（一）重新理解和平演變對中國的影響

鄧小平於「六四」之後接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時表示，北京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動亂，首先是由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煽動起來的。[60]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中國大陸媒體一再重申鄧小平對四至六月危機的解釋：認爲這是由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鄧小平強調是外在因素造成中國出現危機，而非內在因素。一九九〇年四月，鄧小平對共產主義在東歐崩潰及戈巴契夫背叛蘇聯之分析，指出，在當前的國際情勢下，所有敵人的注意力都會集中到中國身上，他們對我們將會無所不用其極來製造麻煩，以造成我們的困難與壓力，而未來三到五年內，黨和國家將會面臨非常艱困的時期。江澤民於一九九〇年五月三日在人民大會堂發表演說時，重申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藉由和平演變來顛覆

[56] 同上，頁 164-168。
[57] 同上，頁 174-176。
[58]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向江澤民和錢其琛表示，中國在處理人權問題要柔。同上，頁 195。
[59] 同上，頁 198-199。
[60] 同上，頁 172-173。

中國的社會制度，並企圖將中國轉變成依賴西方強權的屬國。何新等親近李鵬的決策智囊，在此時撰寫一篇尖銳反美評論，在中國共產黨內流傳，認爲在高科技武器的支持下，美國所提的世界新秩序構想，使得和平演變更具威脅。同時警告，美國將會無所不用其極，陷中國於混亂狀態，並企圖征服及肢解中國，造成一個統一的中國分崩離析。[61]美國在波灣戰爭取得勝利，成爲世界唯一超強，中國部分保守派成員認爲中國成爲最後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將變成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中國重新批評西方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調整過去以西方發達國家關係爲重點，重新爭取第三世界國家支持。[62]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體現中國領導人逐漸調整其對中國威脅的認知，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爲進一步推進其改革開放理念，自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到武漢、深圳、珠海及上海等地巡視。直言無諱地攻擊保守派，並指中國當時受到左派主張的掣肘。鄧小平認爲外國勢力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威脅並不具急迫性，因爲敵對勢力將希望寄託在我們的後面數代，當我們這一代的人仍然存在，並且還有力量時，敵對勢力就會瞭解任何改變是不會有成效的。此外，鄧小平認爲中國面臨的威脅源自內部而非來自外部，如果中國出了什麼差錯，這個錯將會是來自共產黨。此與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的評估相較，出現基本的轉變。[63]

一九九二年之前中國媒體主導權大都控制在左派人士手中，故鄧小平的行程並未被報導，而各類報導主調認爲和平演變比鴉片更具誤導性及欺騙性，和平演變是精神鴉片，故應時時刻刻警覺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及和平演變陰謀放鬆警覺。[64]但一九九二年三月，新華社對其所屬記者下達六頁的指示，要求避免對美進行嚴厲批評，要實行一個有理的、有利、有節的鬥爭，並且避免使用由美國領導的外國敵對勢力言詞，不應輕蔑地提及美國領導人的名字，此後，中國媒體對「和平演變」，「西方敵對勢力的威脅」及「美國帝國主義」的攻擊急遽下滑。[65]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向江澤民和錢其琛表示中國在處理人權問題要「柔」，處理香港問題要「剛」，處理台灣問題要「柔中帶剛」。錢其琛在一九九二年年末外交形勢報告中下達對美政策新方針：「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66]而上述政策方針在一九九二年之後，陸續體現在中美兩國外交互動。

---

[61]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142, 1995, pp.295-316.
[62] Joseph Yu-shek Cheng, op. cit., pp.51-55。
[63] Allen S. Whiting, loc. Cit.
[64] Ibid.
[65] Ibid.
[66] 同註 7，頁 183-184。

美國總統布希在一九九二年八月宣佈要售台 150 架 F-16 戰鬥機，此明顯違反一九八二年中美雙方之「八一七公報」協議。但北京針對此次美國對台軍售，反應相當低調，中國只拒絕出席飛彈技術管制會談，並認爲此舉破壞互信，且危及中美雙邊關係。中國國內媒體對美國之攻擊未使用太過於強烈的情緒性字眼。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國指控中國籍銀河號貨輪載送化學武器原料到伊朗，同時美國對波斯灣國家施壓，要求不得讓該貨輪停泊、卸貨。北京於八月四日發布一份聲明書，嚴正否認，但主動提議由第三國對該船所載貨物進行檢查，九月四日該船停靠在沙烏地阿拉伯檢查，美國及中國人員並未發現禁運化學物品。中國除在聲明中指控美違反國際法外，並未採取激烈的行動來捍衛其自身權利。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美國指控中國違反國際飛彈技術管制協議，將 M-11 飛彈移轉給巴基斯坦，中國亦僅發表聲明否認，沒有激烈反應。再則，北京在海內外舉行盛大的造勢活動，爭取奧運主辦權，但一九九三年八月上旬時，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案，以中國違反人權爲由，力促國際奧委會否決北京爭取主辦奧運會。當北京爭取失利時，中國對外表示尊重奧委會決定，並說中國人民瞭解爭取奧運的主辦權只有一個幸運城市，但是沒有輸家。[67]

從上述的論述過程可以發現，事實上，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國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保守派認爲美國想要顛覆、滲透中國，干涉中國內政，並批評改革開放造成中國經濟上的依賴。[68]但鄧小平認爲只要經濟改革成效能符合中國大部分人民的經濟利益，「和平演變」就不會是嚴重的威脅。而江澤民亦強調中國不會與美國或西方國家搞對抗，但中國也不會在面臨衝突時作出妥協，當面臨衝突時，中國別無選擇，只有堅持到底直到贏得勝利。[69]

鄧小平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認知的轉移，確立中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於內部而非外部之後，加上其在一九九二年南巡的努力，重新確立中國改革開放，與外在世界接軌的政策基調，在此過程中雖歷經保守派及來自軍方的攻擊與批評，但其政策主軸在中國「十四大」中獲得充分體現，一九九二年中國「十四大」將「努力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作爲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任務。[70]中國重新理解天安門事件的成因，但如何理解蘇聯崩潰的成因，亦影響中國對外在世界的認知。

（二）重新理解蘇聯崩潰的成因

---

[67] Allen S. Whiting, loc. Cit.；同註 1，頁 294-302。
[68] 同註 22 ,頁 239-240。
[69] Allen S. Whiting, loc. Cit.
[70] 閻學通，「1996-1997 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對外關係報告」，戰略與管理增刊，北京，1997，頁 4-16。

蘇聯共產黨的瓦解撼動中國共產黨統治合法性，使中國領導人難以再宣稱社會主義乃優異的體制且最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理解蘇聯崩潰的成因乃中國領導人形塑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戈巴契夫改革開放模式對中國而言是一項負面教材。[71]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中國學者及其領導人認爲蘇聯的瓦解完全是所謂和平演變的遏制作用與意識形態顛覆的結果，主要論述爲，美國所領導的外國勢力對蘇聯開展和平演變策略，誘使蘇聯開啓大門，最後蘇聯的政治與經濟事務爲外國勢力所主宰；並讓美國得以將自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價值加諸蘇聯身上。依照中國的和平演變理論，美國用以對付前蘇聯的手段主要包括：貿易、經濟合作、科技轉移、外交活動、文化與教育交流、宗教自由主張等。並認爲西方國家勢必會將目標對準中國。中國大陸曾出版專書，提醒注意美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後可能對中國採取顛覆策略。[72]

中共前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克明對蘇聯瓦解的原因，提出有別於保守派之觀點。劉克明認爲蘇聯瓦解原因，主要係因戈巴契夫新思維及其個人個性造成。戈巴契夫引進多黨體制，造成權力分散，完全否定蘇維埃政治架構，終結共產黨政權。蘇聯領導階層忽視政治與意識形態建設，加上戈巴契夫所犯下的政治錯誤以及蘇聯政府貪污風氣氾濫，乃導致蘇聯瓦解的主因。故建議中國應避免採行多黨體制，以免中國共產黨喪失領導地位；應以馬列主義作爲唯一的意識形態基礎，防止形成多元意識形態；要堅持以共產主義作爲中國共產黨的最後目標，不得採行民主社會主義，並應堅持民主集中制。[73]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及政治研究所羅肇鴻對和平演變或將蘇聯瓦解責任歸咎於戈巴契夫一人之說法提出挑戰，羅肇鴻認爲外來勢力介入不可能是造成蘇聯瓦解的重要因素。其認爲史達林主義走火入魔，管理效能不佳以及錯誤的經濟政策等乃造成蘇聯瓦解的原因；此外，有學者指出：蘇聯問題在於對農業的忽視，種族問題的處理不當，蘇聯對外作出過多的承諾（如入侵阿富汗以及對古巴的慷慨援助），故總體而言經濟問題乃蘇聯瓦解的主因。上述觀點主要反應發展停滯、與外界隔絕、高度集中的計畫作爲及過高的軍事預算等，乃造成蘇聯體制發展落後於西方的主因。此一分析意見所代表的意涵是，假如中國能避免過度集中的計畫作爲、過度龐大的國防開支，自我封閉與外界隔絕，則可避免蘇聯所遭受的噩運。且因計畫經濟體制缺乏價值、利潤與競爭觀念，使企業缺乏活力無創新精神，故在科技上無法與西方競爭，蘇聯要維持在戰略武器方面與美國並駕齊

[71] 同註 22,頁 239-240。
[72] 同上。
[73] 同上,頁 241-242.

驅，傳統部隊要超越美國，使其經濟無法負荷，所以戈巴契夫的個性只是加速蘇聯經濟瓦解的中介變數。[74]

中國領導人及學者對蘇聯崩潰成因的探討經過兩年的論辯，最後達成共識，其結論認爲蘇聯的解體主要原因包括：第一、長期拒絕改革開放，沒有以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爲中心，思想上長期僵化導致經濟上的停滯，使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在人民心目中失去影響力。第二、蘇共內部，特別是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層中存在普遍的腐敗現象，各級黨組織被官僚特權階層、腐敗份子所控制，使蘇共的瓦解和蘇聯的解體成爲必然。[75]

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部分中國學界推翻蘇聯崩潰乃西方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所致的觀點，主要反證在於，假如西方國家早在一九四〇年就開始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何以到一九八〇年代才成功；而國際上敵對勢力如何以和平方式瓦解具有兩千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但未遭受到任何反抗。[76]中國學者及其領導人對蘇聯崩潰成因的理解與認知，重新認識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危害性與急迫性，此歷經認知進化（Coginitive evolutionary）過程。[77]鄧小平認爲中國面臨的威脅源自內部而非來自外部，並主張只要經濟改革成效能符合中國大部分人民的經濟利益，「和平演變」就不會是嚴重的威脅。中國對蘇聯崩潰成因的重新理解，讓中國領導人認識到發展停滯、與外界隔絕、高度集中的計畫作爲及過高的軍事預算乃造成蘇聯落後於西方並導致崩潰的主因。中國經由他者（蘇聯）及外在環境的詮釋定位自我，藉由跨國間互爲主體的分享，重新形塑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角色認同，中國業已認知未來國際競爭關鍵在於綜合國力，其政權的合法性在於透過持續性經濟成長，提昇人民生活水準，故中國需要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俾利集中心力，對經濟進行有效的管理以維持較高的生活水準，進一步將計畫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持續推動科技發展，致力於中國現代化，此乃中國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原因。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中國反和平演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力量逐漸弱化。

江澤民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

[74] 同上，頁 242-245。
[75] 張曉霞，《中國高層智囊》，修訂版（一），京華出版社，北京 2000.09，頁 102-103。
[76] 同註 22，頁 242-243.
[77] 認知進化 Coginitive evolutionary 即指某一特定社會事實或規範，經由跨國間互爲主體的分享，藉由個人或特定社會角色，將各種競爭性的規範及另類的選擇引入政治系統，重新建構決策制定者的集體理解，進而接受新的規範或將該規範制度化。諸如五十年前軍備控制和普遍人權概念並未萌芽，如今已成爲各國理所當然接受的普遍性原則；國際間普遍認爲國際安全有賴軍備控制實踐；國內和國際經濟和環境政策決定逐漸意識到全球資源有限性本質；人權已成爲各國界定其國內民族利益的社會認同。Emanuel Adler,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al “,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3), pp.340-341.

廿週年大會上講話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實行對外開放是符合當今時代特徵和世界經濟技術發展規律要求的，加快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不能依靠別人搞建設，必須始終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爲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必須把立足國內、擴大國內需求作爲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同時又必須打開大門搞建設，必須大膽吸收和利用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和一切進步的東西，大膽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把堅持發揚中國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同積極學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結合起來，把利用國內資源、開拓國內市場同利用國外資源、開拓國際市場結合起來，把對內搞活和對外開放結合起來，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動力。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的今天，中國要進一步完善有關政策，繼續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不斷豐富對外開放的形式和內容，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78]

二、重新定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藉由對天安門事件及蘇聯崩潰成因的探討，調整中國對外在威脅的認知。但在此同時，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自我定位，亦影響中國利益界定與安全政策調整，一旦了解中國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中國在捍衛自身安全上所具備的優勢和劣勢，中國領導人如何看待自己國家易遭侵凌的脆弱之處，則中國的行爲舉止便有跡可循。[79]以下分別探討中國對國際格局的認知與自我定位。

（一）中國對國際格局的認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主要國家依據雅爾塔協議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確定彼此間相對穩定的戰略關係，以美國和前蘇聯爲中心，世界形成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出現兩極的戰略格局，構成兩極長期對峙、對抗的冷戰局面。美蘇兩國的綜合國力，尤其軍實力，在當時都是最強大的，但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維持將近半個世紀的雅爾塔格局終於崩潰。其表現在：第一、蘇聯作爲兩極中的一極已經不存在了。第二、美國、西歐與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出現相互靠攏和有限合作的跡象。第三、華約、北約兩大軍事集團的構成與作用，發

[78]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廿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84-685。
[79] 黎安友（Andrew J.Nathan），陸伯彬（Robert S.Ross）著，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何大明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61-63。

生重大變化。但世界和中國正處在新舊格局矛盾並存和不穩定狀態。[80]

鄧小平在一九九〇年就國際格局變遷提出看法，其指出國際形勢的變化怎麼看？舊的格局是不是已經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經定了？國際上議論紛紛，國內也有各種意見。看起來，我們過去對國際問題的許多提法，還是站得住。現在舊的格局在改變中，但實際上並沒有結束，新的格局還沒有形成。[81]鄧小平表示，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樣也算一極。[82]

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廿三日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演講及九月中共「十五大」報告時均指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這是當今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無論是在全球還是在地區範圍，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經濟領域，多極化趨勢都在加速發展，極少數大國或大國集團壟斷世界事務、支配其他國家命運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大國關係不斷調整，多個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廣大發展中國家總體實力增強，地位上升，成爲國際舞台上不容輕視的一支重要力量。各類區域性組織日趨活躍，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世界多極化格局的形成儘管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這種趨勢已成爲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對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83]

張萬年認爲國際戰略格局正走向多極化，其理由在於，第一、美國欲建立單極世界卻難阻多極化潮流。第二、歐盟力量在不斷增長且自主意識日趨發展。第三、俄羅斯發揮軍事力量的作用力保大國地位。第四、日本加快由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步伐。第五、其他國家和國家集團的實力與地位也在增長。第六、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84]世界將出現多個力量中心，現在至少有美、歐、日、俄、中等五個，今後中國的安全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同其他力量中心的關係。[85]李鵬指各種重要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合作，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86]一九九八年朱鎔基仍認爲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發展，國際關係特別是大國關係正在調整。[87]

---

[80] 洪兵著，《國家利益論》，軍事科學出版社，北京 1999.07，頁 403-406。
[81]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353。
[82] 同上。
[83] 江澤民，「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469。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41-42。
[84] 同註 6，頁 29-37。
[85] 同上，頁 129-138。
[86] 李鵬，「共同努力締造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新世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022。
[87] 朱鎔基，「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

中國領導人認知多極化對中國有利，主要在於彼等認爲兩極世界格局解體後，全球性的軍事對抗已不復存在，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過去因兩個超級大國插手而難以解決的許多國際熱點問題，冷戰後大都通過政治、外交途徑相繼得到解決，或陸續取得一些突破性進展，大國關係出現戰略性調整，中、美、俄、歐、日等國和地區集團頻繁進行高層領導人直接對話，採取多種務實性措施，建立多種形式的戰略夥伴關係，尋求建立相互信任、消除分歧的各種途徑，積極推動和發展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促進國際安全環境的改善，尤其是中美、中俄、美俄達成互不將各自控制下的核武器瞄準對方的協議，有助於增進相互之間的信任，有助於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世界各國獨立自主、合作發展的意識有所加強，和平力量更加壯大，國與國之間相互依存的制約關係不斷加強，維護全球安全的共同利益越來越得到廣泛的認同，國際裁軍與軍控取得新的進展，多數國家改變冷戰時期軍事力量過度膨脹的狀況，紛紛將武裝力量調整到適度規模，新的國際安全機制正在形成和發展，各種雙邊和多邊安全合作方式的出現及聯合國作用的增強，對冷戰思維的軍事集團機制產生強大的衝擊，進一步促進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88]

但中國學者認爲科索沃戰爭表明，西方國家在利益出現重大一致的情況下，仍然會拋棄現存的某些矛盾一致對外。多極化是一個大趨勢，但對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地位並未形成挑戰，到二〇二〇年沒有那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可以超越美國，故若認爲中國已經足與美國對抗，只會成爲中國威脅論的藉口，再 20 年中國亦無法達到美國水平。張召忠認爲中國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基本可成爲一極，這主要體現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權的運用和團結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鬥爭。但中國要在經濟和軍事上成爲一極還有很大的距離。俄羅斯和第三世界國家也不能夠算作一極；就經濟而言，日本和德國已經構成一極，但政治和軍事上還差得遠，法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綜合國力較強，政治、經濟、科技和軍事發展較平衡，但還算不上一極，後來中國學者傾向將世界轉向多極化視爲一種長期的過程。[89]

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當中國與美國關係處於緊張狀況時，中國成功地將「多極化」一辭納入江澤民與葉爾欽及江澤民與席哈克的高峰會聯合公報中。中國的政策顯然在於發展與西歐國家的接觸以擴大他在經濟與科技關係上的選擇，西歐國家原則上可以成爲外國投資與科技技術的來源。但是，難以取代美國

人民出版社，2000，6，頁 795。

[88] 同註 6，頁 19-20。

[89] 杭廷頓認爲當今世界格局既不是單極也不是多極，而是兩者的結合，由一個超級大國與六七個主要大國組成的單一/多極體系 uni-multipolar system，隨著時間推移及中國的發展，歐盟一體化的增強和俄羅斯可能的復興，世界的多極化將會得到加強而不是減弱，但這需要時間。同註 26，頁 17-18。同註 75，頁 226-231。

成爲中國大陸的主要出口市場。由於中美關係在經貿及軍事領域的不對稱性，故對中國而言，改善兩國關係比削弱美國的霸權更重要，聯歐制美的極限在於市場的吞吐量；聯俄制美的極限在於俄內部的民族主義，中國與美國關係處於緊張時，便積極打多極化牌。儘管中國大談多極化的必然趨勢，但中國過去曾與俄羅斯、日本及印度等三個潛在的大國發生衝突且相互毗鄰，一旦真正出現多極化是否對中國有利，值得質疑。[90]但誠如克里斯汀生（Thomas Christensen）所指出的，一旦詢問中國戰略家，其所謂多極是否意味日本相對實力和戰略自主性提高，或甚至指的是印度核武發展，彼等通常否定以對，並陷入矛盾情結。[91]

中國是否具有推動國際多極格局的意圖與能力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中國是否在全球或區域範圍內制衡美國是重要觀察指標。在軍事方面：中國軍事現代化旨在嚇阻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行動，其主要目標在於降低美國介入中國對台用兵的可能性。在外交活動方面：目前並無證據顯示中國企圖建構反美聯盟或弱化美國在全球和區域聯盟，中俄關係對中國而言，主要考量從俄羅斯引進先進武器裝備；對俄羅斯而言，主要考量其軍事企業生產，中俄夥伴關係並非出自於反制美國的戰略。中國對外活動的主要武器，係透過外交宣示對過時的冷戰思維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聯盟提出批判，並提出新安全觀，期待亞太地區能以和平共處五原則建構多邊體制與雙邊關係，此對美在亞太地區之聯盟難以發揮實質性挑戰；再則，諸如美韓軍事聯盟確實發揮穩定朝鮮半島的功能，中國亦希望朝鮮半島維持現狀，中國在防止朝鮮大規模武器擴散方面卻以發揮建設性角色。中國希望朝鮮持續作爲美軍事力量與中國領土的緩衝區。中國對美日軍事聯盟的態度：自一九九六年美日重新修訂安保條約以來，中國領導人擔心此一聯盟成爲台灣獨立的防衛工具，中國在一九九 0 年代一直企圖取得美日承諾不要介入台海兩岸衝突，防衛台灣，希望美國藉美日軍事聯盟限制日本軍力發展並支援美國嚇阻朝鮮。但中國反日情緒激烈，且往往低估中日經濟關係所帶來的利益，目前美國在中國大陸汽車和通信產業的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產業發展具有關鍵性地位。中國對美貿易依賴與中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並與其政權合法性直接相關。[92]雖然

---

[90] Zahmay M.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and Ashley J. Tellis,吳福生譯，《美國與崛起中的中共戰略與軍事意涵（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9.10，頁 30-32。

[91] 中國內部保守派認爲，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必須加以制衡；故許多美國學者認爲中國提出多極的主張係專制的中國企圖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但對中國內部溫和派而言，多極意謂中國不必積極站在美國的對立面去挑戰美國利益，此以主張明顯與美國學者認爲中的多極化論述乃挑戰美國優勢地位的企圖不同。一九九 0 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出兵科索沃，中國充分認知中美軍力差距，故雖仍認爲多極化乃國際格局的長期發展趨勢，但對多極化日趨悲觀。Alastair Iain Johnston , op. cit.,pp.33-34。同註 90，頁 30-32。

[9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op. cit.,pp. 34-44.

中國不喜歡一個由美國或西方主導國際規則制定的國際體系，但在反對美國霸權的同時，中國可從中美經濟關係即美國霸權所提供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獲益，中國可搭此便車，中國實際上傾向在東亞，甚至在全世界採取與美國共同管轄（condominium）的概念而非推動多極格局以取代美國的霸權。[93]

（二）中國的自我定位

中國在歷史上曾有經歷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階段，中國過去曾自我定位爲位居中央之國。[94]中國領導人認知在近現代歷史上多次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掠奪，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長期處於發展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悲慘境地。[95]中國領導人及民眾普遍認爲過去一百年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中飽受西方列強迫害羞辱，因而強烈期望維護國家的尊嚴與領土完整，中國官員與人民常將自己看成是外國霸權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國家主權的勝利者。[96]故自認爲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開闢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才結束一百多年的內戰和外國列強的侵占歷史，實現國內的和平與穩定，使得經濟迅速增長，中國人民成爲自己命運的主人。[97]但半個世紀以來，超級大國基於歷史的殖民主義和現實的意識形態思維，一直對中國推行封鎖、遏制和敵視政策，對中國外部安全環境構成威脅。[98]

基於上述認知，中國領導人將自己定位爲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乃中國基本國情，到一九九〇年代中國仍未發展到令自己滿足的程度，中國對當今世界的貢獻還很小。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確實發生巨大的變化，但底子仍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仍然處於較低水平，不僅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使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也還有很大差距。對中國發展的程度估計過高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陸海邊境線長，周邊鄰國家較多，歷史遺留的邊界和海洋權益爭議較多，在客觀上構成一些不安定因素。而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卻同時處在迅速發展階段，使得中國既要堅持原則，站在第三世界眾多國家一邊，卻又不能將自己放在與西方國家爲敵的位置，因而

---

[93] Ibid.

[94] 班納狄克 •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市：時報文化，民 88 年，頁 19-20。王逸舟，「世紀之交的不變與變：透視 2000 年的國際政治與安全」，李慎明、王逸舟編，《2001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02，頁 12-13。

[95] 李瑞環，「發展當代中國的主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412。

[96] 同註 27，頁 310-314。

[97] 李鵬，「共同努力締造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新世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017-2018。

[98] 同註 75，頁 224-226。

失去合作機會和發展機遇。於是中國以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爲目標，認爲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99]

基於以上的自我定位，江澤民及李鵬進一步界定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其認爲中國是國際大家庭的一員。中國離不開世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需要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世界也需要中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需要中國的穩定和繁榮，如果佔世界人口近 1/4 的中國不發展，長期貧困落後下去，那就會給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帶來嚴重影響。[100]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維護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不論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都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發展了，人們逐步過富足的生活，只會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今後中國發達起來，也永遠不稱霸。[101]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願意同各國政府一道，促進地區衝突和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爲全球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102]

從上述論述可以發現，中國自身的認同充滿不確定性。中國人不但找尋國家的國際地位已經提昇的證據，同時也迅速做出其他國家擔心這種發展並企圖抑制中國的結論，這種對國家信心與民眾驚慌的心理急遽上升，增加中國領導人在進行國際交涉時捍衛國家尊嚴與主權的壓力。[103]

三、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中國爲達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故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積極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生存與發展環境，期能提升綜合國力，於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不斷強調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國領導人對該政策內涵作出如下詮釋。

李鵬等中國領導人指出，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爲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長期的、良好的國際環境，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內容包括：一、堅持獨立自主：在國際事務是講原則的，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中國的立場和政策，決不屈從人和大國的壓力，也不與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二、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宣稱不參加軍備競賽，不搞軍事擴張，堅決反對任

---

[99] 同註 95，頁 1414-1415。王逸舟，同註 94，頁 224-226。

[100] 江澤民，「讓我門共同締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554-1555。

[101] 江澤民，「在美中協會等六團體舉行的午餐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4-66。

[102]李鵬，「在聯合國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282-1283。

[103] 同註 27，頁 316-322。

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行爲，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民族、宗教、人權等問題爲藉口，侵犯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干涉別國內政。三、建立友好合作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的異同來決定國家關係的親疏。四、發展睦鄰友好：中國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對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領土、領海爭端，中國主張通過對話和談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可以暫時擱置，求同存異，不應因此而影響正常的國家關係。五、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以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作爲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基本立足點，積極探索優勢互補的經濟、貿易、科技合作途徑，加強與這些國家在國際問題上的磋商與合作，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六、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中國既向發達國家開放，也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發展。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領導人除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針對中國威脅論興起之勢，中國並提出新安全觀。

四、提出新安全觀

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認爲，當今世界上，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表現爲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競爭。中國作爲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及時抓住這種機遇，不斷增強自己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能力，有效地戰勝各種挑戰，這是一個關乎黨、國家和民族的重大考驗。[104]

基此，中國必須提出一個能因應全球化趨勢，有利其提升綜合國力且能化解中國威脅論疑慮，突破安全困境的安全觀，以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發展環境。[105]但傳統安全論述一向擔心美日阻止中國成爲未來世界強國，故只能千篇一律指出中國不會成爲超級強國，不會追求霸權，且會永遠扮演維持和平與穩定力量，對於中國崛起成爲強國一事不能碰觸，認爲西方國家反中勢力散佈中國威脅論，私底下隱藏遏制中國的企圖。此外，中國領導人再三提醒世人，不應該擔心

---

[104] 江澤民，「教育必須以提高國民素質爲根本宗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頁 876。

[105] 安全觀係指一國內部參與國家安全政策制定的行爲主體對國家安全概念、內涵及國家所處的內外安全環境之認知，並以此作爲價值標準，據以設定國家安全目標，選擇廣泛資訊收集、政策諮詢、雙(多)邊協商談判、高層互訪、威脅使用經濟制裁或武力等一系列政策工具。而一國決策當局對其核心價值與利益威脅來源之認知乃安全觀的主要內涵，其乃後續一切政策選擇的基礎。Brian White, “Diplomac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p.257.；楚樹龍、彭春艷，「冷戰後國際安全理論的發展」，現代國際關係，1999 年第四期，1999 年 4 月 21 日，頁 28-29；閻學通，「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安全合作的構想」，現代國際關係，1997 年第 11 期，1997 年 11 月 20 日，頁 28。

中國會成爲崛起中的軍事強權。如李鵬曾說：中國要達成現代化，起碼需要卅年以上的時間。[106]

自一九九三年起，中國國家領導人及學術界開始研訂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歷經一年努力終於定案。一九九六年七月在印尼舉行之第三屆東協區域論壇中錢其琛首度提出新安全觀，呼籲論壇成員根據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特點，培養新型的區域安全觀。[107]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廿三日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演講時指出，中國堅決拋棄冷戰思維和一切不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做法，中國與俄羅斯及中亞五國將要簽署的裁減軍事協定，就充分體現出完全不同於冷戰思維的一種新安全觀。對於增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信任、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將會提供有益的啓示和開闢新的途徑。[108]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東協成立卅週年，錢其琛指出，冷戰時期以軍事聯盟爲基礎，以加強軍備爲手段的安全觀念與體制已不能營造和平；而面對未來機遇與挑戰，必須要有新的安全觀念以及維護和平的新方式。其內涵包括：第一、在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第二、各國在經濟領域加強互利合作，相互開放，消除經貿交往中的不平等現象與歧視政策，逐步縮小貧富之間的發展差距，謀求共同繁榮。加強地區和世界的金融合作，共同防範國際游資的投機衝擊，創造穩定、安全的外部經濟環境。第三、通過對話與合作，增進相互了解與信任，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與爭端。安全是相互的，安全對話合作旨在促進信任而非製造對抗，更不應針對第三國，不能損害別國的安全利益。[109]

中國國家領導人及學術界反覆闡述新安全觀，主要有四項意義：第一、中國期待自身在國際管理的角色仍隨著國力的提升而獲得加強，但基於中美關係不對稱影響，現階段仍須受制於美國，故主張在國際事務中應拋棄冷戰思維，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做法。第二、一九九〇年代之前，中國大部份時期仍以軍事和外交行動作爲安全槓桿，但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中國已將經濟安全視爲安全的重要內涵，且經濟乃維護國家安全的正常手段。第三、呼籲加強國際事務中的協商和協調，建立真正意義的國際民主。第四、重申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爲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希望今後各項爭端之解決均能以聯合國爲中心，通過安理會的協

---

[106] 同註 22,頁 17-22

[10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 1997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7.5，頁 750。

[108] 江澤民，「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469-2471。

109 同註 7，頁 271-273。大公報，香港，1997 年 12 月 16 日，第一版。

調合作推進國際安全。[110]凸顯中國逐漸體認綜合運用政治、軍事和經濟手段來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性。[111]

五、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中國當時正處於迅速發展階段，其正積極提升綜合國力，外界預測中國在廿一世紀將成爲一個強權與美國競鬥；但中國在軍事上落後，又爲維護領土與主權完整所苦；中國乃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同時是核武俱樂部成員，但中國不與任何集團結盟，並聲稱自己乃第三世界的成員；中國批評資本主義制度，但同時又是世界十大貿易國之一；中國遼闊的內地農村培育出一種內視的文化，但在沿海地區又居住一群放眼世界，且有四海一家觀念的人口，其總人口數比東亞地區所有的工業國及新興工業國家總人口數還要多，中國是一個具有全球舉足輕重的區域性強權；從某些角度而言，其處於中心地位，但在某些議題，其卻站在世界事務的邊緣。[112]但中國作爲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分，被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扮演全球舞台上或建設性或批判性的重大角色。[113]

江澤民及李鵬等中國領導人認爲，冷戰結束後，雖然總的說來國際局勢趨於緩和，但世界還充滿錯綜複雜的矛盾，世界和平與穩定還受到嚴重的威脅，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仍然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領土、民族、宗教、資源等因素引發的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連綿出現，擴大軍事集團、加強軍事同盟，無助於維護和平、保障安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沒有得到改變，還在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仍有億萬人民處於貧困狀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114]故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宣示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努力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

---

[110] Wu Baiyi, “The Chinese Security Concept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USA,2001, vol.10, 27th, pp.282-283.王逸舟，同註 94，頁 11-12。

[111] 雷家驌主編，《國家經濟安全理論與方法》，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12，頁 18-24。

[112]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Tellis, op. cit.pp.204-206.

[113] 王逸舟，同註 94，頁 12-13。

[114] 李鵬，「在聯合國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冊，《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282-1283。江澤民，「讓我門共同締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554-1555。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41-42。李鵬，「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二 0 一 0 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日報出版社，北京:1997.12，頁 1780-1782。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264-1266。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15]

中國所提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之構想，主要來自於被壓迫的想像及中國希望強化其國際管理者角色的期望。中國雖高舉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之大旗，但中國軍事能力有限，其經濟、社會、政治均處於發展中國家水平。科技水準不足，限制其工業能力，在改善龐大人口生活條件以及社會穩定與政治體制上存在諸多脆弱因素，使得中國缺乏實踐其理想政經秩序的物質基礎，自身的認同充滿不確定性。中國對目前國際秩序不滿意，並希望強化其國際管理者的角色，但中國不樂意否決區域和國際共識，如在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均認爲美國在區域前沿部署有助穩定時，則中國不敢公開反對，並容許美太平洋艦隊在香港停泊渡假。[116]事實上，中國在亞太地區仍是一個安全的消費者，並非是安全的生產者，其仍無法創造其所理想中的安全環境。[117]

總體而言，一九九〇年代中國仍堅持按照「冷靜觀察、沉著應付、有所作爲、絕不當頭」的方針處理國際事務，以利抓住時機發展自己，把國內的事情辦好。[118]在對外活動的主要武器，係透過外交宣示對過時的冷戰思維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聯盟提出批判，期待亞太地區能以和平共處五原則建構多邊體制與雙邊關係，此對美在亞太地區之聯盟難以發揮實質性挑戰。[119] 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國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另一項重要舉措就是積極參與聯合國活動，藉以提升其國際影像力。

六、積極參與聯合國活動

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第 2758 號決議案以 76 票贊成、35 票反對、17 票棄權的情況下，中國取得聯合國席位，在一九七〇年代中國選擇性、象徵性參與聯合國特別機構，此階段中國採取體系改革取向，中國自許爲第三世界國家代言人，其參與的立場設定並非藉聯合國爭取國家利益，爲中國發展服務的角色，而是將聯合國作爲反霸、反美鬥爭舞台。故到 一九七七年中國僅參與 21 個政府性質的國際組織，在非政府性組織方面只參與 71 個；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全面建構政府間

---

[115]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廿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90-691。

[116] 哈理斯（Stuart Harris），追求強權地位的漫漫長路，田弘茂、朱雲漢編，同註 13，頁 182-183。Bonnie S. Glaser, “Disscussion of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USA, 2001, vol.10.27th, pp.303-308.

[117] Michael D.Swaine . Ashley J.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Rand, 2000, pp.204-206.

[118]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廿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690-691。

[11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4 Spring 2003.04, pp.34-44.

組織聯繫網絡，一九八〇年參加聯合國軍控會議，一九八二年參加人權委員會，一九八三年趙紫陽出席聯合國大會，一九八四年取得國際法庭席位，中國參與聯合國的行爲，在角色扮演上，從體系改革者轉變成體系維持者，開始注重如何藉參與聯合國相關活動，協助其四個現代化，但中國對聯合國如何進行改革仍然興趣不大。[120]

一九九〇年代聯合國雖然無法有效動員各項資源，以回應全球性問題對共同安全之威脅，但聯合國在後冷戰時期，已日益成爲全球防範人道安全、社會、經濟和生態生存空間威脅及轉型制度建設、共識建立、標準設定的場所。中國要成爲世界強國，聯合國對其而言益形重要。聯合國作爲一個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有多重原則、目標和功能，正如其運用多種且程度各異的影響力施加在成員國身上，聯合國某些功能雖不彰，但其仍是新獨立國家尋求合法性的權威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宣稱其爲國際上中國的唯一合法性代表，以此指控台灣彈性外交、疆獨與藏獨等活動違反國際法相關原則。[121]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各國紛紛制裁中國，中共政權合法性受到衝擊，但因聯合國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且賦予大國否決權地位，中國透過聯合國尋求其國際合法性最大化，此有利其對國內民眾動員與訴求。[122]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瓦解後，中國立即承認 12 個新共和國，主要擔心台灣捷足先登，引起各國效尤，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雙重承認。一九九三年台灣開始尋求加入聯合國，中國的主要反制籌碼在於其可動用否決權，阻擾聯合國新會員國加入。[123]

冷戰結束後中國對參與聯合國抱持更積極的態度，中國積極運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及影響力，作爲抵制美國單邊主義槓桿。一九九二年李鵬出席安理會高峰會，一九九四年出席里約地球高峰會，一九九五年出席哥本哈根社會發展世界高峰會，江澤民並於一九九五年出席第五十屆聯合國大會，截至一九九六年中國共計參與 51 個政府性組織及 1079 非政府組織，比一九七七年增加 14 倍，並簽訂各種多邊條約（詳如表二～一）。[124]而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行爲及其對維和行動的立場，充分展現其政策選擇上面臨原則宣示與務實利益考量的衝突。

---

[120] Samuel S. Kim,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press, 1999, pp.44-46.
[121] Ibid.,pp.48-49.
[122] Ibid.,p.71.
[123] Ibid.,pp.48-49.
[124] Ibid.,pp.44-46.

表二～一：1960-1996 主要國家參與國際組織概況

	1960	1966	1977	1984	1986	1987	1989	1992	1994	1995	1996
中國	2	1	21	29	32	35	37	44	50	49	51
	30	*58*	*71*	*355*	*403*	*504*	*677*	*856*	*955*	*1013*	*1079*
台灣	22	39	10	6	6	6	6	7	7	8	10
	108	*182*	*239*	*429*	*419*	*464*	*554*	*695*	*775*	*809*	*865*
日本	42	53	71	60	58	60	58	61	62	61	63
	412	*636*	*878*	*1296*	*1222*	*1420*	*1583*	*1749*	*1863*	*1889*	*1970*
法國	90	100	104	93	67	81	83	88	85	88	87
	886	*1168*	*1457*	*2227*	*1704*	*2264*	*2598*	*2879*	*3038*	*3127*	*3255*
英國	76	90	91	79	63	72	71	70	71	74	71
	742	*1039*	*1380*	*2021*	*1607*	*2091*	*2416*	*2681*	*2846*	*2918*	*3031*
美國	59	68	78	65	33	59	64	66	62	64	64
	612	*847*	*1106*	*1593*	*804*	*1579*	*1933*	*2127*	*2273*	*2327*	*2418*
蘇聯/俄羅斯	29	37	43	73	69	69	61	48	48	58	62
	179	*295*	*433*	*668*	*646*	*714*	*806*	*1074*	*822*	*1093*	*1300*
全球	154		252	365	369	311	300	286	263	266	260
	1255		*2502*	*4615*	*4649*	*4235*	*4621*	*4686*	*4928*	*5121*	*5472*

資料來源：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ited, 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press, 1999,p.47.表中黑政體字代表政府性組織，斜體字代表非政府性組織。

（一）投票行爲

在國際議題的論辯上，中國一向樹立原則大旗，其主要基於中國傳統大同世界觀、百年屈辱的歷史經驗及馬列毛思想中反資、反帝、反霸成分；故在外交辭令上，中國宣示捍衛以下原則：第一、和平共處五原則。第二、主張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政經秩序。第三、在國際關係上不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第四、所有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富與窮，在處理國際事務上一律平等。第五、中國永遠站在發展中國家之列，不尋求稱霸或超強地位。[125]故中國相較於其他常任理事國而言，在第三世界國家仍保有較好影響管道和信任度，特別是在人權委員會。雖然上述原則不斷出現在中國相關對外政策宣示之中，然一旦有利可圖則務實以對。

一九九〇至二〇〇〇年聯合國安理會計通過 674 項決議案，中國對其中 25 項議案投棄權票，棄權比例高於俄羅斯（5 次）、美國（2 次）、法國（2 次），俄羅斯曾使用否決權，中國未曾使用否決權。中國棄權投票行爲年代分布爲一九九〇年（1 次）、一九九一年（0 次）一九九二年（3 次）一九九三年（2 次）一九九四年（4 次）一九九五年（3 次）一九九六年（4 次）一九九七年（4 次）一九

[125] Wu Xinbo,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USA, 2001, vol.10.27th, pp.296-299.

九八年（1 次）一九九九年（3 次）二〇〇〇年（0 次）中國棄權投票行爲用以反對聯合國對個別國家採取制裁行動共 14 次，反對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或觀察團介入國內事務共 11 次，見表二～二。中國在相關議決時投棄權票比率共佔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 73%，見表二～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使中國獲得大國地位象徵，並作爲其追求特殊利益的工具，其投票行爲有以下特點。第一、刻意突顯反制西方國家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採取強制性措施，反對北約以人權高於主權爲藉口侵犯他國主權，尤其聯合國對其主要友邦如北韓、古巴、利比亞、伊拉克、蘇丹、南斯拉夫進行制裁時，其傾向採取棄權立場。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廿九日聯合國安理會以十二票贊成、古巴和葉門二票反對、中國一票棄權，通過第 678 號決議案，授權會員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維護、執行聯合國決議，恢復海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126]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一日聯合國對有關向北韓進行經濟制裁之第 825 號決議案進行投票結果，以 13：0 通過，中國和巴基斯坦棄權。[127]中國投棄權票原因在於中國爲了不得罪主張干涉的國家，同時又不希望因支持這些國家的訴求，而喪失中國過去自己所堅持的原則與立場，所以中國一般採取投棄權票方式。第二、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在大多數議題上均持冷漠態度，然一旦觸及台灣或西藏問題，中國立即採取抗議，要求各國不得介入任何國家內部事務。如聯合國對瓜地馬拉及馬其頓維和行動，中國威脅使用否決權懲罰兩國親台行動。面臨台灣要求加入聯合國，否決權的運用既是矛亦是盾，其通常採取棄權立場杯葛，藉以宣示其一個中國政策，對台進行外交施壓。[128]

中國在聯合國對個別國家採取制裁行動時投棄權票，一則基於實力不足考量；再則，可作爲討價還價籌碼。中國目前只是一個區域性大國，並非全球性強權，故除關注與亞洲周邊地區國家有關議題外，若相關衝突事件或議題是在中國能力所不及的地方發生，且事態發展不直接衝擊中國既得利益，針對該項議題，中國總是聲稱堅持和平共處五原則，反對大國干涉、保衛國家主權與平等的高調。如此一來，既可運用聯合國反對美國霸權，又不損及其作爲開發中國家領袖之地位，可建立維護國際正義之形象，又不必面臨長遠與眼前利益、經濟與政治需求、歷史友誼與新組合、老原則與新現實、友好國家要求與自身利益衝突的選擇窘境，符合其國家利益。中國乃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公開宣示其所堅持的原則不可侵犯，可藉以增強其與其他主要大國討價還價籌碼，或在涉台等相關議題交

---

[126] 同註 1，頁 96-104。

[127] Samuel S. Kim, op. cit.,p.55.

[128]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不在與其根本利益無關之議題耗時間，在大多數議題上均持冷漠態度，且在議題討論上，也都聽命於北京，故李道豫曾被稱爲看窗外的大使 Ambassador Looking Out the Window，事實上，在保持冷漠同時，中國仍觀察其他代表之言行，據以掌握大多數國家感覺走向。 Ibid.,pp.57-62.

換他國讓步，北京即使在最後面臨國際壓力，不得不作出讓步時，中國也會提出一套說法，即使中國政策出現前後不一或進行交易時，由於只有極少數高層領導與職業外交官在掌管中國外交，故容易在空話浮辭的外衣下，將其掩蓋。根據中國的自我詮釋及解讀，在聯合國的棄權的投票行爲，並非怯懦行爲，而是對複雜環境的彈性反應。[129]

表二～二：１９９０年代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行爲統計

1990 年代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行爲統計				
時間	議案名稱	內容	投票結果	說明
1990.08.02 至 1990.11.28	660 、 661 、 662 、 664 、 665 、 666 、 667 、 669 、 670、674、677 等決議	1990.08.02 起安理會陸續通過，處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續問題	通過決議中國贊成	中國認爲科威特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得到尊重
1990.11.29	678 號決議	11.29 提案，除非伊拉克在 1991.01.15 前完全執行安理會各有關決議，否則授權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會員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執行安理會有關決議	通過決議中國棄權	錢其琛表明中國反對侵略，主張和平解決，反對訴諸武力原則與立場
1990.09.20	668 號決議	確認全面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框架	通過決議中國贊成	
1990.05 至 1990.12	672、673、681 號決議	聯合國尋求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通過決議中國贊成	
1990.03.27	654、656 號決議	解除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延長中美洲觀察團及監測尼加拉瓜境內停火、部隊隔離及遣散抵抗力量任務。	通過決議中國贊成	
1990.06	658 號決議	聯合國派公民投票特派團赴西撒哈拉	通過決議中國贊成	
1990.06	海地問題	聯合國派員監督海地大選	聯合國大會協商通過	中國認爲海地問題屬國內事務，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不構成威脅
1990	682 號決議	聯合國駐塞浦路斯部隊	通過決議中國贊成	中國對 1990 年內聯合國派駐黎巴嫩臨時部隊、駐戈蘭高地隔離接觸觀察員部隊、駐兩伊軍事觀察團、中美洲觀察組等案均投贊成票
1991.01 至 1991.12	計 12 項決議	1991 年安理會共通過 12 項決議，確立波灣戰爭停火、派遣維和部隊、進行人道主義援助、賠償及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一系列問題作出具體規定	通過決議中國贊成	中國派遣 15 名軍事觀察員參與聯合國行動

[129]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陸伯彬（Robert S. Ross）著，《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何大明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 42-43。

1991.05	694 號決議	審議以色列驅逐巴勒斯坦人問題，要求以國遵守第四項目日內瓦公約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1.06 至 1991.12	713、721、724 號決議	對南斯拉夫實行武器禁運並派遣維和部隊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0.10.16	717 號決議	確認柬埔寨問題全面政治解決進程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1.10.31	718 號決議	成立柬埔寨過渡時期聯合國權力機構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2.01 至 1992.12	726、799 號決議	審議以色列驅逐巴勒斯坦人問題，要求以國停止驅逐行動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2.01.21	731 號決議	審議利比亞涉嫌炸燬泛美班機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2.03.31	748 號決議	對利比亞涉嫌炸燬泛美班機採取制裁措施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認爲制裁無助於解決問題，應以協商對話解決分歧
1992.02.28	745 號決議	建立聯柬權力機構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2.07.21	766 號決議	要求各方履行柬埔寨問題有關巴黎協定義務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2.08.26	773 號決議	伊拉克與科威特畫界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2.01 至 1992.12.03	733、746、751、767、775、794 號決議	授權聯合國秘書長及有關國家採取一切必要行動爲索馬里境內人道主義救濟行動創造安全環境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2.10.02	778 號決議	征用伊拉克部分被凍結海外石油資產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認爲征用一國被凍結資產涉及該國主權和複雜法律問題
1992.11.30	792 號決議	要求各方履行柬埔寨問題有關巴黎協定停火義務及進行克制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已配合聯合國派遣 47 名軍事觀察員、3 名文職人員及 400 人組成的工程兵大隊
1992.01 至 1992.12	743 等決議	1992 年安理會共通過有關對南斯拉夫派遣維和部隊、人道援助、制裁、禁飛區等一系列問題具體規定 23 項決議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中國重申制裁可能使局勢惡化，反對採取任何形式的武力手段解決衝突，並主張保留南斯拉夫聯盟聯合國席位
1992.12	797 號決議	聯合國莫桑比克行動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3.01 至 1993.12	807、815、836、847、869、870、871 號決議	聯合國派赴南斯拉夫保護部隊延長問題及授權該部隊在自衛時採取包括武力在內的必要措施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3.01 至 1993.12	816 號等決議決議	制裁南斯拉夫；在波黑境內設置禁飛區；授權各國在該區內使用武力；解除對波黑地區武器禁運等案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3.03.26	814、837、865、878、885、886 號決議	授權聯合國部隊推動索馬里民族和解可採強制性行動，並進行人道救助。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3	806、833 號決議	聯合國伊拉克觀察團及伊科邊界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3	883 號決議	強化對利比亞制裁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3	810 、 826 、 835 、 840 、 860、880 號決議	聯合國駐柬臨時權力機構主持柬全國大選事宜及該機構選後撤離等案。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中國並派出 10 名大選監督員
1993.06	867 號海地和平進程相關決議	對海地實施石油和武器禁運、派遣聯合國特派團、實施海上封鎖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中國雖不贊成採制裁等強制措施但因相關決議促進政治解決故贊成
1993	846、891、872 號決議	設立聯合國烏干達及盧旺達觀察團及援助盧旺達特派團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3.02 至 1993.12	806、814、831、836、844、858、860、866、867、892 號決議	聯合國對格魯吉亞等地派出維持和平部隊及軍事觀察員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4.03 至 1994.12	899、949 號決議	聯合國安置伊科邊境公民及要求伊拉克從伊科邊境撤軍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4.03 至 1994.12	908 、 914 、 947、958、943 號決議	聯合國駐南斯拉夫部隊授權及任期問題、放鬆對南聯盟制裁行動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4.03 至 1994.12	942 號決議	加強對波黑塞爾維亞族制裁決議另對南聯盟制裁草案俄羅斯投否決票，中國投棄權票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4	997 號決議	解除索馬里各派解除武裝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4.06 至 1994.11	929、955 號決議	聯合國向盧旺達派遣多國部隊，設立國際法庭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4	916 號決議	聯合國莫桑比克行動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4	919 號等三項決議	取消對南非武器禁運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4	940 號等決議	授權會員國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恢復海地合法政府地位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5.04.14	986 號等決議	逐步解決對伊拉克制裁滿足伊國人民人道需求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5.04.14	988 號決議	部分解除對南聯盟制裁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5.06.16	998 號決議	向波黑派遣快速反應部隊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除 988、998 兩案外中國對其餘 24 項議案均投贊成票
1995.01.30	975 號決議	聯合國處理海地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6.04 至 1996.10	1076 號決議	聯合國推動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4.18	1052 號決議	要求黎巴嫩各方立即停止敵對行動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4.18	1073 號決議	要求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立即停止一切使局勢惡化行動，並立即恢復談判（美國投棄權票）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3.27	1051 號決議	加強對伊拉克進口軍民兩用物資和技術監督機制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6.12	1060 號決議	要求伊拉克接受聯合國特委會赴伊觀察制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8.08	986 號決議	要求對伊拉克出口石油定價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1.31	1044 號決議	要求蘇丹不得從事、縱容、支持恐怖主義活動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4.26	1054 號決議	對蘇丹實施制裁（中國與俄羅斯棄權）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6.06 至 1996.12	1062、1092 號決議	延長聯合國駐塞浦路斯部隊解決塞、土種族衝突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8.16	1070 號決議	對蘇丹實施航空制裁（中國與俄羅斯棄權）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6.10 至 1996.11	1078、1080 號決議	授權多國部隊對扎伊爾東部人道危機進行干預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01 至 1996.12	1058、1074、1088 號決議	宣佈終止對波黑塞族制裁，並派遣多國和平部隊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中國對決議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採取強制性措施及使用武力持保留立場
1996.02 至 1996.06.31	1048、1063 號等四項決議	延長聯合國海地特派團並增加人數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6.10.22	1077 號決議	聯合國駐格魯吉亞觀察團內設人權辦事處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6.07.26	1067 號決議	古巴擊落美民用飛機問題（中國與俄羅斯棄權）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認爲安理會應以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決議爲基礎
1997.01.10	1094 號決議	聯合國向瓜地馬拉派遣軍事觀察員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認爲危地馬拉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活動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1997.02.18	1097 號決議	解決扎伊爾東部形勢五點和平方案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7.03.28	1101 號決議	在阿爾巴尼亞成立多國保護部隊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不贊成安理會對國內事務採取行動
1997.06.04	1111 號決議	伊拉克石油換食品決議延長 180 天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7.06.19	1114 號決議	延長駐阿爾巴尼亞多國保護部隊任期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不贊成安理會對國內事務採取行動
1997.06.21	1115 號決議	推持制裁伊拉克審查行動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7.07.01	1118 等七項決議	設立聯合國駐安哥拉觀察團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7.10.07	1132 號決議	對塞拉利昂軍政府實行制裁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7.10.23	1134 號決議	加強對伊拉克制裁（俄、法、埃及、肯亞及中國棄權）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7.11.12	1137 號決議	對阻礙聯合國武器核查之伊拉克政府及軍事官員實施旅行限制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8.03 至 10.13	1160、1199、1203 號決議	對科索沃地區南聯盟實施武器禁運、要求南聯盟停止軍事行動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認爲干涉南聯盟內政將助長分離及恐怖主義
1998.06.12 至 1998.12.03	1173、1213 號決議	安哥拉和平進程及延長聯合國觀察團行動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8.08.27	1192 號決議	在荷蘭設立蘇格蘭法庭審判洛克比空難嫌疑犯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9	1226、1227 號決議	審議埃塞厄比亞及厄立特里亞衝突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9.10.15	1267 號決議	對阿富汗塔利班所控制的航空公司實施禁運，並凍結塔利班資產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9.01 至 1999.08.24	1229、1237、1268 號決議	延長聯合國駐安哥拉觀察團任期及衝突政治解決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9.05.14	1239 號決議	通過關於聯合國在科索沃之人道主義行動決議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反對北約以人權高於主權爲藉口侵犯他國主權
1999.06.10	1244 號決議	聯合國在科索沃地區進行救援行動問題決議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1999	1242、1266、1275、1281、號決議	伊拉克裁軍及人權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9	1280、1284 號決議	建立聯合國監督、核察及視察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委員會（俄、法、馬來西亞及中國棄權）	通過決議 中國棄權	中國主張將核查與中止制裁行動掛勾
1999.08.06 至 1999.11.05	1234、1258、1273、1279 號決議	審查剛果局勢部署 90 名軍事連絡員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999.03.11 至 1999.10.22	1220、1231、1245、1260、1270 號決議	審查塞拉利昂問題派駐觀察員任期延長確保局勢平穩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2.07	1289 號決議	聯合國派團赴塞拉利昂擴編至 13000 人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2.24	1291 號決議	聯合國決議在剛果維和行動進行第二階段部署，擴大派遣人員增至 5537 人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3.31	1293 號決議	同意伊拉克政府用於購買石油設備零配件金額由原三億美元增至六億美元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	1297 號決議	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衝突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2.07	1298 號決議	對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實施一年期武器禁運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5.19	1299 號決議	聯合國派團赴塞拉利昂後續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7.08	1302 號決議	延長伊拉克石油換糧食計畫延長 180 天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	1304 號決議	要求盧旺達、烏干達及所有外國軍隊撤出剛果維和行動進行第二階段部署，擴大派遣人員增至 5537 人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7.05	1306 號決議	對塞拉利昂實施 18 個月鑽石禁運（索馬里棄權）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7.31	1312 號決議	建立聯合國解決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衝突問題特派團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	1313 號決議	聯合國派團赴塞拉利昂後續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	1315 號決議	聯合國派團赴塞拉利昂後續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	1316 號決議	剛果維和行動相關部署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	1317 號決議	剛果維和行動相關部署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09.15	1320 號決議	擴編聯合國解決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衝突問題特派團增至 4200 人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	1321 號決議	聯合國派團赴塞拉利昂後續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12.18	1322 號決議	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過渡使用暴力（美國棄權）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12	1323 號決議	剛果維和行動相關部署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12.05	1330 號決議	同意伊拉克石油換糧食計畫再延長 180 天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12	1332 號決議	剛果維和行動相關部署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12	1333 號決議	禁止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員國際旅行、關閉境外辦事處，實施武器禁運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2000.12	1334 號決議	聯合國派團赴塞拉利昂後續問題	通過決議 中國贊成	

1.1990-2000 年聯合國安理會計通過 674 項決議案，中國對 25 項議案投棄權票，棄權比列高於俄羅斯（5 次）、美國（2 次）、法國（2 次），俄羅斯曾使用否決權，中國未曾使用否決權。
2.中國棄權投票行爲年代分布 1990（1 次）1991（0 次）1992（3 次）1993（2 次）1994（4 次）1995（3 次）1996（4 次）1997（4 次）1998（1 次）1999（3 次）2000（0 次）
3.中國棄權投票行爲用以反對聯合國對個別國家採取制裁行動共 14 次，反對聯合國派遣維和部隊或觀察團介入國內事務共 11 次，但總體行爲並無一致性，惟刻意突顯反制西方國家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採取強制性措施，反對北約以人權高於主權爲藉口侵犯他國主權；尤其聯合國對其主要友邦如古巴、利比亞、伊拉克、蘇丹、南斯拉夫進行制裁時，其傾向採取棄權立場；另聯合國對其非邦交國且與台灣有邦交國家進行維和行動時，其採取棄權立場杯葛，藉以宣示其一個中國政策，對台進行外交施壓。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中國外交概覽：1990-1997；中國外交 1998-2000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表二～三 1990-1996 五個常任理事國在安理會投票行爲

	1990 Y/N/A	1991 Y/N/A	1992 Y/N/A	1993 Y/N/A	1994 Y/N/A	1995 Y/N/A	1996 Y/N/A	棄權數	否決總數
中國	36/0/1	40/0/2	65/0/9	87/0/6	73/0/4	63/0/3	53/0/4	29	0
法國	37/0/0	42/0/0	74/0/0	93/0/0	77/0/0	66/0/0	57/0/0	0	0
蘇聯/俄羅斯	37/0/0	42/0/0	74/0/0	91/1/2	75/1/2	61/0/5	53/0/5	14	2
英國	37/0/0	42/0/0	74/0/0	93/0/0	77/0/0	66/0/0	57/0/0	0	0
美國	37/2/0	42/0/0	74/0/0	93/0/0	76/0/1	66/1/0	56/1/1	2	4
棄權數	1	2	9	8	7	8	10	45	
決議案	37	42	74	93	77	66	57		
否決數	2	0	0	1	1	1	1		6

資料來源：Elizabeth Economy Michel Oksenberg, Edited, 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press, 1999,p.62。

（二）參與維和行動

中國領導人對於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宣示嚴格遵循聯合國憲章的有關規

定，不能成爲變相干預內政，更不能捲入衝突，成爲戰爭的一方等原則。[130]而中國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乃是一個辯證演化的過程，在考量現實利益與作爲第三世界國家領袖需求間取得平衡，但中國不支持以聯合國之名使用武力，或對個別國家進行制裁，尤其對其周邊的友好國家。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一年中國對維和行動採取原則反對不參與的立場，一九八〇年首次參與塞普路斯維和行動表決，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九年轉爲支持並參與的立場，在一九八〇年代除在一九八二年四月三日對福克蘭群島 502 號決議案外，中國在相關表決中未曾棄權。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曾高度評價聯合國維和行動，並將之定位爲有效解決區域衝突的國際政治機制，一九八九年年首次派遣五個觀察員赴中東，20 個文職人員赴那密比亞。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波灣危機初期，中國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對聯合國安理會第 678 決議案之討論與表決，中國以附和 678 號決議案並提倡國際正義聲明的策略，突破「六四」後國際對其進行的外交制裁。[131]一九九二年四月中國派遣 47 位軍人，400 位軍事工程人員參與聯合國赴柬埔寨政權轉移觀察團。[132]

中國爲參與聯合國相關活動，因應多樣化的全球性議題，在其官僚部門持續進行制度調整，新建與國際組織接軌的相應部門，聯合國在此一演變過程扮演重要角色。[133]中國經常以常任理事國中唯一開發中國家代表自居，並利用威脅使用否決權以取得其想獲得之利益，捍衛其在聯合國安理會所具有的象徵性和戰略利益。[134]中國逐漸降低其在敏感性議題之阻擾行爲，在安理會傾向採取棄權投票或要脅而非實際運用致命的否決權，此皆基於形象成本考量。聯合國附屬之國際體制及相關專門機構，業已成爲中國外交談判人才訓練的主要基地，在中國內部建構一個知識社群 epistemic communities，一九九〇年代在軍控領域至少培養 280 個專家，彼等陸續在相關刊物發表論文，影響中國決策認知與規範。一九八〇年代人權領域的知識社群亦已形成。在環保方面，一九九二年中國便有 200 個研究機構，聘用 17,000-20,000 位科技人才從事相關研究，並有 2,000 多個組織，650,000 人參與環保工作；此外，聯合國主導的相關談判和會議，亦引導中國以白皮書形式回應，如一九九一年中國發表人權白皮書，一九九五年發表中國人權進展白皮書，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發表中國人權進步成就白皮書，分別提出另類理論或

---

130 江澤民，「讓我門共同締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554-1555。
131 Samuel S. Kim, op. cit.,p.54.
132 Ibid.,p.55.
133 Ibid.,pp.71-72.
134 Ibid.,pp.57-59.

形式以回應國內外對中國人權狀況之指控與挑戰。[135]但中國在參與國際軍控體制方面，其行爲並無一致性，且常出現陷入參與或對抗的矛盾。

七、參與國際軍控體制

中國政府認爲，裁軍的目的是增進而不是減損各國安全，應加強國際軍控條約的普遍性；繼續通過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多邊談判機制，進行談判，締結新條約。應防止發達國家在憑藉其先進軍事科技和經濟實力謀求絕對安全和軍事優勢的同時，將裁軍和軍控目標引向廣大發展中國家，剝奪其正當的自衛權利和手段；擁有最大、最先進常規和核武庫的國家，應履行其對裁軍負有的特殊責任，應全面整頓和改造現有的歧視性和排他性的出口控制制度和安全，在普遍參與的基礎上，談判制定公平合理的防擴散制度。中國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奉行不主張、不鼓勵、不從事核武器擴散和不幫助別國發展核武器的政策。但認爲，防止核擴散 不能無視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正當權益要求，更不能採取雙重標準，以防止核擴散爲藉口，限制和損害發展中國家和平利用核能。中國宣稱其核出口遵循三原則：第一、僅用於和平的目的。第二、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第三、未經中國允許不得向第三國轉讓。中國主張國際社會應促進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軍控和裁軍，但非常強調國家主權，要求超強當盡應盡的責任。此一認知係因中國視軍控體制爲超強企圖制度化其霸權地位之努力，對中國沒有任何助益。[136]

一九九Ｏ年代中國外在安全威脅降低後，中國意識到其若在某些裁軍和軍控領域缺席，則在國際地位、國際關係改善和進入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之成本提高，一旦其面臨強烈國際共識，則將增加對其單邊行動能力之限制。尤其當中國意識到特定區域出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將危及其安全利益時，中國便轉爲主動積極參與國際軍控體制，如中國提議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共同譴責印巴核試。[137]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體制，對美作出雙邊保證或採取特定單邊裁軍行動，以下分別探討中國在傳統武器和核擴散方面的立場與實際作爲。

在傳統武器擴散方面：一九八八年中國外長曾宣示中國武器出口三原則，一爲強化他國自衛能力；二則促進區域和平穩定；三爲不介入一國內部事務，此後衍生不得違反聯合國憲章，不得造成他國侵略、擴張、軍事佔領或種族及殖民宰

---

[135] Ibid.,p.74.
[136] 同註 6，頁 207-208。
[137] Bates Gill,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Nonprolifeation and Arms Control Policy- Making: Broadening Perspectives and Policy…But Only to a Point”, in David M. Lampton, ed., op. cit., pp.280-282.

制；不得助長走私、國際恐怖主義等非法活動。中國做出類似宣示主要表達中國乃一個負責任的武器輸出國。自一九八〇年中期以後中國武器、科技輸出遞減，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中國主要軍售伊朗、緬甸等國，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六中國佔全球 4%武器輸出，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中國佔全球武器輸出比例又降爲 2%。[138]

在核子武器擴散方面：中國不願將其戰略核武端上檯面，乃基於其相對於美、俄、日而言，在傳統武器能力相對弱勢，故不希望透明化，以取得其他國家對其能力估算猜測之優勢，希望這些國家高估中國核戰力。中國認爲此有助其嚇阻能力，並可藉此提升其國家地位，但此一做法卻招致周邊國家批評衍生中國威脅憂慮。[139]

一九九〇年代中國在軍備控制上採取如下作爲：

一九九一年中國人大決議參加聯合國傳統武器註冊（UN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在一九九二及一九九三年中國曾提供武器進出口資料，但到一九九四年卻未將採購項目提供登記。[140]一九九二年批准禁止核子擴散條約，一九九三年中國簽署化學武器公約，此乃中國首次簽署必須接受檢查的條約。一九九四年保證履行飛彈控制 MTCR 協定，一九九七年九月宣布裁軍五十萬。而過去中國認爲其有漫長的疆界，故主張中國使用人員殺傷雷乃合法且必須的防衛武器，但在一九九六年保證中止人員殺傷雷出口。一九九六年年中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中國分別向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提供核安全保障。中俄雙方宣佈不將各自的核彈頭瞄準對方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俄、哈、塔五國在長達七千多公里的邊境地區就裁減軍事力量達成協議。[141]一九九七年參與核出口控制多邊機制（ZANGGER）委員會，但批評該委員會存在差別對待和排除出口控制機制等安排必須修訂；一九九七年中止提供伊朗核子和反艦巡弋導彈相關技術；一九九八年同意中止對南亞輸出彈道導彈及相關科技；中止未經核安全查驗

---

[138] Bates Gill, op. cit., pp.260-265.

[139] Ibid., pp.259-266.

[140] 聯合國傳統武器註冊乃重要軍備及科技轉移監控組織 UN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 。此機制要求成員國制員提供傳統武器年度進出口資料，旨在提升武器轉移的透明度。同註 27，頁 134-137。Ibid., pp.260-265.

[141] 中國於一九六四年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一九八 0 年首次參與聯合國軍控會議；一九八二年簽署禁止非人道武器公約；一九八二年中國針對戰略核武裁減曾年提出「三停一減」建議，即美蘇停止核試、改良、生產核武，並削減 50%核彈頭，作爲其他核武國家停止核試進入談判之條件，一九八三年簽署簽署 Antarctic treaty 及外太空條約；一九八四年年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簽署生物武器公約；一九八五參與全面禁止核試談判；一九八九年與蘇聯擴大信心建立措施、簽署南太平洋非核區公約。江澤民，「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頁 2472。Bates Gill, op. cit., pp.260-265.

之核設施出口。雖然中國從美俄戰略核武裁減中獲益，但仍對抗美國對其傳統武器輸出之施壓與管制。[142]

世界各國參與軍備控制體制的動機各有差異，有些基於集體安全觀，有些基於現實政治對於國際政治本質之單邊安全利益考量，現實政治取向的安全觀認爲國際環境是無政府取向，國際社會乃由權力導向的民族國家構成，各國尋求宰制或平衡，尋求利用他國使自己安全最大化，現實政治戰略一般強調獲取優勢強制性能力，並採取攻勢戰略作爲，此戰略乃單邊取向，對各國間相對實力非常敏感，面對共同威脅時，不排除與他國結盟，但仍拒絕集體安全、安全互賴的論述，認爲他國處於相對弱勢時則其國家較安全，但爲了避免較具優勢國家進一步增強其軍力，防止科技劣勢國家取得較強能力，限制新的科技擴散，或希望取得國際威望與地位時，仍不排出支持軍備控制體制。[143]

集體安全理念係非零和遊戲，強調貿易夥伴及國際經濟制度使彼此共同獲益，因而使各項談判出現新的可能性。以集體安全爲假定參與軍備控制通常基於對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等概念之認知，彼等認爲任何單邊努力企圖增強軍力終將迫使其他國家進行軍備建設，形成反制聯盟，採取先制攻擊，進而弱化國家安全，因此某國安全得以確保唯有其他國家亦自覺安全，而軍控體制的核心概念即集體安全，此亦即西方自由民主共同體內在安全取向。[144]而支持集體安全戰略並不代表其行動的利他性，亦非表示這些國家不自私，其與現實政治取向主要差別在於接受制度化的承諾，以避免不穩定的單邊行爲。[145]

中國安全戰略乃現實主義取向，獨立自主戰略乃其基本原則，而中國自認爲其已從一個相對弱勢的國家日益崛起，且已取得大國地位，並被主要大國所尊重，這些形象的自我認知更強化現實主義戰略傾向，中國崛起不會成爲威脅的歷史良善觀點經過深刻社會化過程，中國領導人對參與軍控安全體制的認知仍囿於如何爲中國取得優勢地位，俾在國際鬥爭中獲得主定地位，使集體安全概念在中國戰略設計及政策選擇無存在的空間。如中國對於集體安全概念及對其軍力發展附加限制之要求，採取保守支持的態度，試圖將該體制對其施加之限制最小化，故特別強調主權，避免限制中國能力，並致力於保有並改善其相對能力。所以中國到一九九七年才中止提供伊朗核子和反艦巡弋導彈相關技術，一九九八年美國才確認中國中止對巴基斯坦的相關援助。[146]中國雖然不排除參與軍控體制，但上

---

[142] Ibid., pp.259-266.
[143]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98.
[144] Ibid.
[145] Ibid., p.99.
[146] Ibid., pp.108-110.

述迷思卻給國家中心的民族主義概念留下更多的空間。[147]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曾指出，通過高層互訪，中國與亞太經合組織、東盟等區域性組織的關係取得重要進展；這有利於保持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良好國際環境及周邊環境，也有利於促進和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有利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擴大國際影響，在國際鬥爭中處於更加主動的地位。[148]

中國參與國際軍控體制主要來自國際壓力及內部關於國際形象考量，有些情況係受相對安全保障等因素考量所驅動，從現實主義取向改變軍備控制議題，如中國藉參與國際非擴散機制防止印、巴、北韓核擴散威脅，防衛潛在敵國限制中國軍事能力。一九九〇中國並未面臨明顯立即的核威懾，但中國擔心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CTBT 後，美俄彈道飛彈和防禦系統弱化中國的威懾力，中國在國際核武裁軍計畫相關發言，旨在爭取時間，加速建立可信度高的嚇阻及報復能力，中國領導人支持積極研發精確性高的投射系統，故調動大量資源發展戰略核武計畫，持續給予財政和政治上的支援。[149]一九六四到一九九六年底中國共進行四十五次核試驗，一九九〇年對聯合國要求 CTBT 投棄權票，中國擔心此將妨礙其核威懾能力及核現代化，一九九二年加入 NPT；一九九二年五月廿一日進行 700KILOTONS 到 1.8MEGATONS 地下核試，此後計有八次低於 150KILOTONS 核試；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宣稱將在一九九六年簽署，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參加聯合國大會就 CTBT 議題進行討論，並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參與協商。但從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六中國每年進行兩次核試，以確保其在簽署 CTBT 之前其核武的可信賴度，並力求彈頭小型化，中國核武現代化並非要取得量的平衡，而爲求質的提昇，縮短與核大國之差距。中國聲稱其支持 CTBT 以交換主要核大國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沙祖康表示，CTBT 生效後十年，禁止和平用途試驗，但仍反對他國運用衛照科技及間諜等手段進行監測，或進入他國進行查證，而主張由國際組織進行監控的機制安排，並要求必須有 CTBT 執委成員國的 30/50 同意後才能對單一地點進行查證，使國際核監控更形困難，中國最後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廿四日簽署 CTBT。[150]在此過程中國表現相當投機，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六年八月國際上籠罩反對核擴散和核試驗的氣氛架構下，美、俄、英已非正式延緩核試多年，且強力要求中國加入，法國亦在一九九六年一月進行最後一次核試，

---

[147] Ibid.,p.100.

[148] 江澤民，「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159。

[149] 中國參與系列禁核協定，諸如外太空條約、海床武器控制條約、反戰術核武等一系列區域性非核協定，但這些條約或協定對中國核武部署未能發揮實質限制效果。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107.

[150] Bates Gill, op. cit., pp. 259-266.

中國成爲最後的落隊者，亞洲鄰國亦對其施壓，尤其其他常任理事國均加入相關談判，必然形成中國簽署的壓力，且一九九六之前發展中國家已形成共識，視全面禁止核武試驗條約爲控制核武擴散的核心，中國向以第三世界國家發言人自居，如延後簽署有損其國際形象。[151]故當印度決定不參與簽署後，中國立即放棄干擾談判之立場，因印度反對該條約，如此一來印度必須單獨承受弱化 CTBT 壓力。[152]

中國在軍控領域之知識社群已經成熟，但因受限於中國領導人的現實主義決策傾向與認知，故尚未發生典範轉移，但中國的政策選擇已逐漸受國際網絡、知識社群、國際地位的相對關係和安全的現實環境所限制，中國參與不同的國際軍控體制，其退出的成本亦不斷上升，在美國施壓及國內制度交互影響下，中國參與軍控體制的行爲逐漸與國際規範及實踐接軌，日益多元化，辯論增加，然過程並不平順。[153]

八、建立負責任大國形象

中國在國際社會上，中國是核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在預防地區衝突和消除熱點麻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議題負有重大責任，向世界各地蔓延以及改革包括安理會在內的聯合國各種職能機構等方面，中國向以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代表身分發言，在國際舞台上，必須扮演建設性或批判性角色。[154]中國領導人亦曾宣示，中國願意同各國政府一道，促進地區衝突和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爲全球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155]

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基於與周邊國家建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體現成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行爲模式，日益留心其國際形象成本與獲益之估算，而將國際形象納入成本考量成爲中國指導多邊外交的重要因素，正如其較積極參與聯合國裁軍、經濟、人權和環保體制，以及聯合國所支持之全球性會議，此亦表現在中國逐漸降低其在敏感性議題之阻擾行爲，在安理會傾向採取棄權投票或要脅而非實際運用致命的否決權，此皆基於形象成本考量。

---

[151]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op. cit., p. 108.

[152] Ibid., p.107.

[153] 中國領導人參與國際軍控體制仍然是基於國防、主權與改善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獲得核能技術支援等自利因素考量，中國參與安全體制之安全體制之政策選擇仍執著於其自身利益，比較類似美蘇在核武軍備競賽時期的思維，而非接受國際不擴散規範或理解合作安全。Ibid., p.118.

[154] 王逸舟,「總序」,收錄於 Barry Buzan, Ole Waever,and Jaap De Wilde,朱寧譯,《新安全論（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2,頁 1-4.

[155] 李鵬，「在聯合國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冊，《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頁 1282-1283。

一九九〇年代，中國對其國際形象特別關心，致使中國參加許多機構，接受多種國際義務，甚至當這些義務與中國的政治、軍事利益相悖時，中國也接受。[156]

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曾評估外匯儲備充足，還債的壓力不大，外資進入中國外匯市場興風作浪並不容易，國內市場廣闊，有相當的工業基礎，有科技和人才優勢，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特別是社會穩定，這些都是中國保持人民幣穩定的可靠條件。[157]故在周邊許多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經濟的穩定確實做出積極貢獻。[158]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此舉雖然贏得世界各國的廣泛讚譽，但卻出現市場疲軟和速度下滑問題，同時在政策選擇上面臨兩難，讓中國付出不少代價，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稱中國外貿及外資流入受到非常不利的影響。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維持不貶值，出口及外來直接投資下滑，一九九八年上半年出口下降 4.6% ；外來直接投資下降 20% ，零售物價指數下降 3.2% ；消費物價指數下降 1.8% 。一九九八年陸續採取刺激投資並積極引進外資；壓制儲蓄並刺激消費；提昇私人企業；停止價格戰並控制商品供應等措施，總體經濟直到一九九九年末期才復甦。出口下降其中原因之一來自於亞洲各國需求下降，而中國大陸對亞洲各國出口佔 55% 。[159]誠如江澤民一九九八年二月廿六日在十五屆二中全會上所言，中國宣佈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國際社會很歡迎，但這是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和一定代價。[160]但正因爲中國未採取可能惡化區域經濟危機，以鄰爲壑的自利措施，故獲得亞洲精英的高度評價，有助中國在亞洲地區建立負責任領導者形象。

---

[156] 阿拉斯泰爾 • 伊恩 • 約翰斯頓 Alastair Iain Johnston 指出，美國爭論誰是或者誰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時，其代表這個國家親美國或很少與美國發生分歧，但對負責任一詞的定義一向非常模糊，它通常是指一個國家遵守遊戲規則。但遊戲規則本身就是矛盾的，如人權的國際標準是在 1993 年維也納的人權會議上制定的，他把個人政治權利和團體社會權利基本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中美兩國都忽略，美國將個人政治權利放在團體社會權利之上；中國則將團體社會權利放在個人政治權利之上。兩國均忽略現行國際人權準則的二元本質。但如果中國領導人逐步認識到，中國的國際形象與被承認爲一個負責任大國（一個能夠積極促進那些發揚市場自由化、多元政治選擇、社會包容性、機會均等、珍惜無辜生命等價值觀的多邊機構發展的國家）身分聯繫在一起，那麼，全球積極擁護準則之士，就能夠通過多邊機構對中國施加壓力，使中國奉行這些自由價值觀。同註 26，頁 115-116。

[157] 江澤民，「做好國內經濟工作，增強承受和抵禦風險的能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202-206。張曉霞，《中國高層智囊》，修訂版（二），京華出版社，北京 2000.09，頁 54-55。

[158] 朱鎔基，「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769-770。

[159] Chu yuan Cheng, “China's Economy: Recent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Prospects”, in Jaushieh Joseph Wu, *China Rising: Implication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Growth in the PRC*，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2001, pp.1-27.

[160] 江澤民，「做好國內經濟工作，增強承受和抵禦風險的能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頁 202-203。

小結

一九九〇年代東歐遽變，蘇聯解體，持續 40 多年的冷戰狀態宣告結束，國際安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領導人自我評估有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在機遇方面，中國領導人認爲和平與發展已成爲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爭取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是可能的。並認爲多極化趨勢已成爲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世界將出現多個力量中心，各種重要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合作，中國的安全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同其他力量中心的關係，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國並成功地將「多極化」一辭納入江澤民與葉爾欽及江澤民與席哈克的高峰會聯合公報中。但中國過去曾與俄羅斯、日本及印度等三個潛在的大國發生衝突且相互毗鄰，一旦真正出現多極化是否對中國有利，值得質疑。中國領導人一再表示美國的國力逐漸弱化，國際格局正由一超多強向多極發展；此明顯與美國領導者可望繼續保有在區域和全球主導地位之意圖衝突。

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領導人認知其面臨國際制裁、全球化負面效應、霸權主義、中國威脅論興起等威脅與挑戰。在國際制裁方面，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以後中國面對美國、日本及歐洲等國制裁，中國認爲世界上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制裁不會損害中國。但從中國後續釋放的訊息及所採取的行動顯示，中國急於解除國際制裁對其現代化建設之衝擊。面對經濟全球化，中國領導人認爲經濟全球化有如一把雙刃劍，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主要面臨保護和發展本國經濟、打破發達國家的經濟壟斷和封鎖、提高參與國際競爭力等嚴峻的挑戰。但中國仍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合作與競爭，並未凸顯其危害性與急迫性。此外，中國領導人以原霸主國必然遏制新興崛起的大國爲假定，認爲霸權主義遏制中國的暗流仍在湧動，並指控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之霸權行徑包括干涉內政、軍事介入、經濟制裁和文化滲透，一九九九年北約對南斯拉夫展開軍事攻擊後，中國對美國霸權主義成爲戰爭根源之批評與示警聲浪急遽升高。而中國威脅論肇因於中國的地緣戰略特點以及中國國力持續增長；且中國對外來事件的過度反應，導致其他國家將中國的威脅看的比實際情況更嚴重，如此形成惡性循環。故外界將中國與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的德國和日本類比，認爲中國經濟發展、國力增強，就必然對外擴張。然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基於與中國發展成爲一個安定的、開放的和成功的國家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之考量，與中國展開建設性交往，逐漸化解中國對外界有關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中國在一九九〇年代面對上述國際安全威脅，作出突破國際制裁、堅持改革開放政策、重新定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提出新安

全觀、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積極參與聯合國、參與軍控體制並致力建立負責任大國形象。

在突破國際制裁方面，中國領導人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雖在言論上刻意漠視西方國家制裁的危害性，但在行動上卻理性面對一九八九年之後來自西方國家制裁，調整外交戰略部署，先穩固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重點開展對第三世界的外交，紮穩中國的外交陣腳，即時釋放緩和中美關係訊息。並以中國具有廣大市場爲籌碼，拉攏跨國企業赴陸投資。同時，捉住機遇，精確掌握波灣戰爭時機，靈活運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身分，突破國際制裁。

在堅持改革開放政策選擇上，中國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認爲天安門乃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藉由和平演變來顛覆中國，並企圖將中國轉變成依賴西方強權的屬國所致，而蘇聯崩潰亦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但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認爲外國勢力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威脅並不具急迫性，中國面臨的威脅源自內部而非來自外部。中國對蘇聯崩潰成因的重新理解，讓中國領導人認識到發展停滯、與外界隔絕、高度集中的計畫作爲及過高的軍事預算乃造成蘇聯落後於西方並導致崩潰的主因。而中國未來參與國際競爭關鍵在於綜合國力，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在於透過持續性經濟成長，提昇人民生活水準，故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

在中國領導人重新定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方面，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中國人不但找尋國家的國際地位已經提昇的證據，同時也迅速做出其他國家擔心這種發展並企圖抑制中國的結論，這種對國家信心與民眾驚慌的心理急遽上升，影響中國的政策選擇。一九九〇年代中國認爲其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以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爲目標，故需要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並自視爲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有助中國融入世界體系。

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方面，中國爲積極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生存與發展環境，期能提升綜合國力，故作出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宣示，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行爲，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民族、宗教、人權等問題爲藉口，侵犯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干涉別國內政。但同時表明，不與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不參加軍備競賽，不搞軍事擴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在新安全觀方面：中國面對中國威脅論興起之勢，爲防範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遏制中國，乃提出新安全觀，強調在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在經濟領域加強互利合作，相互開放，消除經貿交往中的不平等現象與歧視

政策，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與爭端，以因應全球化趨勢，在提升綜合國力的同時突破安全困境。

在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方面，中國認爲一九九〇年代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沒有得到改變，故提出努力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訴求。此主要來自於被壓迫的想像及中國希望強化其國際管理者角色的期望。中國雖高舉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之大旗，但中國軍事能力有限，其經濟、社會、政治均處於發展中國家水平，缺乏實踐其理想政經秩序的物質基礎。

在參與聯合國活動方面：中國曾將聯合國作爲反霸、反美鬥爭舞台，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各國紛紛制裁中國，中共政權合法性受到衝擊，中國透過聯合國尋求其國際合法性最大化。冷戰結束後，中國積極運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及影響力，在全球性議題上，有效運用否決權並以投棄權票方式，提升國際地位，使其在第三世界國家仍保有較好影響管道和信任度。並威脅使用否決權，打壓台灣國際生存空間。而聯合國周邊國際體制及相關專門機構，業已成爲中國外交談判人才訓練的主要基地，在中國內部建構一個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

在參與國際軍控體制方面：一九九〇年代中國外在安全威脅降低後，中國意識到其若在某些裁軍和軍控領域缺席，則在國際地位、國際關係改善和進入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之成本提高，一旦其面臨強烈國際共識，則將增加對其單邊行動能力之限制，尤其當中國意識到特定區域出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將危及其安全利益時，中國便轉爲主動積極參與國際軍控體制。如中國藉參與國際非擴散機制防止印、巴、北韓核擴散威脅，防衛潛在敵國限制中國軍事能力，但中國對於集體安全概念及對其軍力發展附加限制之要求，仍採取保守支持的態度，試圖將該體制對其施加之限制最小化，故特別強調主權，避免限制中國能力，並致力於保有並改善其相對能力。然中國的政策選擇已逐漸受國際網絡、知識社群、國際地位的相對關係等因素限制。

在建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方面：自一九九Ｏ年代以來，中國基於與周邊國家建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體現成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行爲模式，日益留心其國際形象成本與獲益之估算，國際形象成爲中國指導多邊外交的重要因素，促使中國參加許多機構，接受多種國際義務，甚至當這些義務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利益相悖時，中國也接受。如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未採取可能惡化區域經濟危機，以鄰爲壑的自利措施。雖然中國對外出口及外來直接投資下滑，但仍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經濟的穩定確實做出積極貢獻。

隨著中國軍事、經濟實力增強，中國在參與世界體系的過程其領導者所追求的是維持現狀（status quo） 或是修正主義（revisionist）的外交政策乃是一個具有爭論的問題。從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東協區域論壇，國際金融體制，加入四方會談，促成上海五國會議，擱置主權爭議，公佈國防白皮書，開展人權對話，加入世貿組織，積極尋求多元化的糧食及能源管道可以發現中國乃現存國際體系的維持者。但中國以霸權主義及強權政治仍存爲藉口，提出推動多極化格局，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主張，以及在參與國際軍控體制不一致甚或口惠而實不至的行爲，卻又令人懷疑中國是一個現存國際政經秩序的挑戰者。然總體而言，現存國際及區域政經體制，確實有利於維持中國和平發展，提升綜合國力，故經由國際體制的影響及知識社群引進理念，並提供安全政策的另類選擇，全球互賴的觀念，逐漸表現在中國領導人的談話中，中國提出新安全觀，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均有利於中國建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